

# 法国的中国宗教研究综述\*

巫能昌

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宗教系

**摘要：**本文首先考察了法国汉学中宗教研究学统的建立，然后根据时序和宗教类型两条线索，对法国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宗教研究进行了分类述评。同时，本文还简要地介绍了目前法国学界与中国宗教研究有关的科研机构、研究人员、研究计划和他们的主要成果，概括了法国方面中国宗教研究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法国汉学 中国研究 中国宗教

众所周知，法国历来是欧洲汉学重镇，而宗教研究则是法国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越来越多汉学体系之外的法国学者也开始从各自学科出发，对中国宗教进行考察。近年来，宗教之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地被重新认识。在此背景之下，对法国的中国宗教研究作一个相对全面的综述是有必要的。然欲述其研究，必先溯其学统之确立与发展。是故笔者将先考察法国汉学及其中宗教研究学统的建立，然后再分古典社会至秦汉时期宗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及西藏原生宗教、道教相关、当代儒教、新兴宗教、少数民族宗教、基督宗教、摩尼教和祆教、伊斯兰教、宗教权威、宗教现代性等条目加以评述。最后，本文还将简要地介绍目前法国学界的相关研究项目及计划，并概括法国方面中国宗教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 学统的确立与发展：研究机构

法国汉学学统的确立可以追溯到 1814 年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设立的首个欧洲汉学讲席“中国、鞑靼、满洲语言与文学”，而汉学中宗教研究学统的确立则要以 1889 年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远东与印第安美洲宗教”讲席的设立为标志。发展到今天，汉学研究早已内化为法国科研体系的一部分。法国现

行的“混合研究单位”(Unité mixte de recherche)科研体制也对汉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混合研究单位主要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负责在大学或其他研究机构中组建并共同管理。这种体制极大地便利了资源共享和学术流动。<sup>①</sup>就中国宗教研究而言,属于混合研究单位的重要机构有:东亚文明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de l'Asie Orientale)、社会·宗教·政教关系研究所(Groupe Sociétés, Religions, Laïcités)、中国、韩国及日本联合研究中心(Centre Chine-Corée-Japon)、喜马拉雅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Himalayennes)、人类学与社会学比较研究组(Laboratoire d'Ethnologie et de Sociologie Comparative)等。除国家科研中心外,这些机构的共建单位主要还有法兰西学院、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和巴黎第七大学(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等。此外,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和汉学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也是汉学研究的重要机构。

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是法国精英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座古老的学府成立于1868年,其宗教学部则诞生于1886年。汉语学界熟知的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等诸多大师都曾任教于宗教学部。法国的中国宗教研究与该部相关讲席的设置休戚相关。1889年,首个与中国宗教有关的讲席“远东和印第安美洲宗教”设立,担任讲席教授的是著名的东方文化学家德·罗斯尼(Léon de Rosny 1837-1914)。1907年,“远东和印第安美洲宗教”讲席一分为二,“远东宗教”讲席由此诞生。其首任担纲者是被整个西方称为中国研究“导师”的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1913年,沙畹的学生葛兰言接任此讲席。1931年以后,墨司它(Édouard Mestre 1883-1950)、阿格诺埃(Charles Haguénauer 1896-1976)等其他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在此讲席名下开设讲座。1940年葛兰言逝世后,“远东宗教”讲席空缺。墨司它则在1941年成为新设立的“印度支那宗教”讲席教授。1943年新设的“中国宗教”讲席当为“远东宗教”讲席的延续,由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2-1945)担纲。不过,马伯乐于次年逝世,此席位再次空缺。直到1945年,阿格诺埃重新开讲“远东宗教”,主要讲中国和日本宗教,也涉及朝鲜宗教。

---

\* 本文只是对法国的中国宗教研究作简单梳理,以使国内同仁对目前法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有大概的了解。汲喆先生为本文的撰写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并对本文的初稿作了详细的修订;岑咏芳女士提供了几篇关键的参考文章,并主要对“研究机构”部分提出了宝贵意见;刘清华君对“基督宗教研究”部分提出了宝贵意见。笔者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sup>①</sup> 详参孙承晟:《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及其合作制度》,载《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5期,2008,页52-56。

1950 年，石泰安（Rolf-Alfred Stein 1911-1999）进入宗教学部，主讲“中国和亚洲高地宗教”，继续主讲“远东宗教”的阿格诺埃则集中于日本和朝鲜宗教。1957 年，“中国和亚洲高地宗教”讲席发展为“远东与高地亚洲宗教比较”和“中国宗教”两个讲席，前者继续由石泰安主讲，后者则由康德谟（Max Kaltenmark 1910-2002）主讲。1971 年，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开始在这两个讲席名下，分别与石泰安、康德谟合开或单独开设讲座。1973 年，石泰安将“远东与高地亚洲宗教比较”改为“西藏宗教”，施舟人不再于此开设讲座，桑木丹·噶尔美（Samten G. Karmay）开始于此开设讲座；1974 年，石泰安休假一年，讲席改由云丹嘉措（Yonten Gyatso）主持。1975 年，布隆多（Anne-Marie Blondeau）接任“西藏宗教”讲席，直至 2003 年。期间，又有谢萧（Cristina Scherrer-Schaub）、马修·卡普斯坦（Matthew T. Kapstein）等学者曾在此讲席名下开设讲座。“中国宗教”讲席则在 1979 年康德谟退休后，由施舟人担纲直至 1999 年。期间，还有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 1942-1994）、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郭丽英等学者在此讲席名下开设讲座。2000 年开始，劳格文（John Lagerwey）接任施舟人的位置，并将讲席名称改为“道教史与中国宗教”。期间，吕敏（Marianne Bujard）曾在此讲席名下开设讲座。劳格文退休后，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在 2012 年接任此讲席。此外，宗教学部在 1993 年设立了“汉文化圈的信仰与思想体系”讲席，由马克（Marc Kalinowski）主持至今。

法国远东学院的前身是 1898 年在法国金石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和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的共同推动下成立的一个常设考古团队，1900 年更名为法国远东学院。实际上，它是效仿之前已经成立的法国雅典学院、法国罗马学院、法国开罗东方考古研究所而设立的。这些海外学院共同构成了法国研究异文化的独特体系。1990 年代，远东学院依次在台湾、香港、北京等地设立中心，更是促进了其在中国方面的研究。就中国宗教研究而言，远东学院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沙畹和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对中国的考察正源于此。在远东学院历任和在任的 30 余位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员中，有 21 位都主攻宗教或者在宗教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其中，以研究佛教见长的为石泰安、休伯（Edouard Huber）、谷岚（Fabienne Jagou）、郭丽英、雅克·梅（Jacques May）、王微（Françoise Wang-Toutain），佛教、基督教兼修的为谢和耐（Jacques Gernet），佛教、道教兼修的有戴密微（Paul Dèmiéville 1894-1979）、苏远鸣（Michel Soyumié 1924-2002）。道教研究方面有饶宗颐、马伯乐、施舟人、索安（Anna Seidel 1938-1991）、

劳格文、傅飞岚、吕鹏志、宗树人 (David A. Palmer)。伯希和则在摩尼教等诸多领域作出过杰出贡献。此外, 还有研究汉代哲学与宗教的马克, 主要研究汉代宗教的吕敏和研究湖南宗教的华澜 (Alain Arrault)。

汉学研究所于 1920 年由法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共同签约成立, 其初衷在于通过推动中国古代与近代的高等研究, 成立图书馆及出版汉学著作以促进中法文化交流。与此相关地, 汉学研究所的图书馆是欧洲最重要的汉学图书馆之一, 尤其收藏与 1929 年之前中国有关的文献。汉学研究所出版的汉学著作则主要有三个系列。第一系列为“汉学研究所文库”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于 1932 年以沙畹的一本著作揭开序幕。第二系列为始于 1943 年的通检、书目及汉学文献资料之著作。第三系列为始于 1975 年的“汉学研究所专刊”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主要发表优秀博士论文和同水平论著。汉学研究所于 1968 年开始正式直辖于法兰西学院。<sup>①</sup>

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可以追溯到 1973 年由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四部与国家科研中心合办的敦煌写本研究组 (Équipe de Recherche sur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创建人为苏远鸣。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 敦煌写本研究组发展为汉文写本金石图像文献研究中心 (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es Manuscrits, Inscriptions et Documents Iconographiques de Chine), 到 1996 年更名为中国文明研究中心 (Centre de Recherche “Civilisation Chinoise”), 并在 2006 年初成为新成立的中国、日本和西藏文明研究中心 (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Chinoise, Japonaise et Tibétaine) 的一部分。出于将其它东亚国家也纳入研究范围和发展跨民族研究视角的考虑, 中国、日本和西藏文明研究中心又更名为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不过其构成仍为中国、日本和西藏这三个文明研究组。研究中心由国家科研中心、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巴黎第七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共建, 其很多成员同时也在这些创建单位中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施舟人等中国宗教研究学者, 该中心的中国文明研究组历任或在任、或者有协同研究关系的相关学者还有侯锦郎 (1937-2008)、戴思博 (Catherine Despeux)、罗禅能 (Jean-Noël Robert)、雷米·马蒂厄 (Rémi Mathieu)、杜德兰 (Alain Thote)、穆瑞明 (Christine Mollier)、马颂仁 (Pierre Marsone)、

<sup>①</sup> 〈法兰西学院与汉学研究〉, 未刊稿, 原法文本撰于 1998 至 2000 年间, 岑咏芳女士提供中译本, 页 1、3。关于汉学研究所更详细的介绍参见戴仁: 〈法国汉学研究所简介〉, 耿昇译, 载《法国汉学》, 第 2 辑, 1997, 页 357-359; 葛夫平: 〈伯希和与巴黎中国学院 (笔者注: 即汉学研究所)〉, 载《汉学研究通讯》, 第 26 卷第 3 期, 2007, 页 33-41。

何玉惟 (Sylvie Hureau)、郭艾思 (Grégoire Espeset) 等学者。西藏文明研究组则有今枝由郎、马修·卡普斯坦、卡蒂亚·毕夫特里耶 (Katia Buffetrille) 和让-吕克·阿沙尔 (Jean-Luc Achard) 等西藏地区宗教研究的专家。

另有六个机构对中国宗教研究亦具有特殊意义。首先，喜马拉雅研究中心是藏学研究的重镇，其主体成员为人类学学者。这里有费尔南·梅耶 (Fernand Meyer)、施帝恩 (Stéphane Gros)、奥雷莉·内沃 (Aurélié Névot)、尼古拉·西雷 (Nicolas Sihlé)、拉谢尔·吉多尼 (Rachel Guidoni)、雷米·谢 (Rémi Chaix) 等学者。其次为社会·宗教·政教关系研究所。其前身是让·博贝罗 (Jean Baubérot) 创建于 1995 年的宗教与政教关系社会学研究所，2006 年改为今名。其最初的成员，一部分来自当时解散的国家科研中心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组，另一部分则来自当时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成立不久的政教关系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研究组。在中国宗教研究方面，目前这里主要有贾珞琳 (Caroline Gyss-Vermande)、高万桑、方玲、皮卡尔 (François Picard, 兼职)、汲喆 (兼职) 等学者，施舟人在退休前也曾在这个研究所主持工作。此外，该研究所艾文 (Marie-Dominique Even) 和沙怡然 (Isabelle Charleux) 的研究也涉及到中国的蒙古与新疆。第三是 1996 年成立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Centre d'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它隶属于中国、韩国及日本联合研究中心。目前，该中心在中国宗教方面主要有乐唯 (Jean Lévi) 和杜瑞乐 (Joël Thoraval)。一年前去世的伊丽莎白 (Élisabeth Allès 1952-2012) 曾长期在这个中心工作，是法国研究中国穆斯林的专家。第四，巴黎第七大学历来就有中国研究的传统，曾在这里教学或学习的学者有贺碧来 (Isabelle Robinet 1932-2000)、莫尼卡 (Monica Esposito 1962-2011)、郭艾思等，目前则有毕游塞 (Sébastien Billioud) 主攻儒教与一贯道研究。第五，巴黎第十大学的人类学与社会学比较研究组亦有两位主攻中国宗教的学者。她们是贝桂菊 (Brigitte Baptandier) 和谢道琳 (Adeline Herrou)。第六，历史悠久的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拥有欧洲最大的中文系，在其中国研究中心 (Centre d'Études Chinoises)，研究中国宗教的有王论跃 (Frédéric Wang)、戴文琛 (Vincent Durand-Dastès)、黎北岚 (Pénélope Riboud) 和汲喆。戴思博在退休前、程艾蓝 (Anne Cheng) 在 2008 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中国智识史”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de la Chine) 讲席教授之前，也都在这个中心工作。

## 古典社会至秦汉时期宗教研究

本节主要收入法国学者对中国古典社会至秦汉帝国时期宗教的研究。由于道教、佛教等方面将在下文作专门梳理，故除沙畹对投龙仪式的考察（与其之前对泰山的研究紧密相关）外，这里均暂不讨论。如此，则该领域早期的学者主要有沙畹、葛兰言、马伯乐和康德谟。1970年代以来的学者则主要有毕梅雪、马克·乐唯、马克·杜德兰、吕敏和雷米·马蒂厄等。

早在1890年，沙畹就细致地译注了《史记》中有关封禅的记载，并进行了初步讨论。<sup>①</sup>此外，他也是西方第一位对中国古代的社神进行专门考察的学者。1900年，沙畹在一次国际宗教史会议上宣读了题为《中国古代宗教中的社神》的论文，并于1910年以《中国古代的社神》为题，将这项研究的修订版附在其名著《泰山：关于一种中国崇拜的专题论文》的正文之后。这篇长文依次讨论了不同层级的社神、社坛、社树、象征社神的石柱、社神与日食、旱涝之时的社神、社神与收成、职司惩罚之社神、社神与祠堂、先于后土出现的社神等。《泰山》的主体部分则有六章，即泰山崇拜、泰山志、关于封禅的文献摘录、祭文、碑刻、民间信仰，最后再加上结论。其中，泰山崇拜、民间信仰、结论为作者的讨论部分，其它则为文献编译，但加入了很多实地考察所得的资料。其中，民间信仰部分依次讨论了关于泰山的传说，以及作者认为最能体现泰山神力的五岳真形图、泰山镜与泰山印。在结论部分，作者主要分析了建构泰山崇拜的元素，揭示了泰山从辐射范围有限、主要与自然秩序相联系（正如封建诸侯与政治秩序的关系）、从属于天（正如封建诸侯从属于君主，即天子）的崇拜，发展到职司注生注死，然后在佛教的影响下又成为冥府判官，再到一个与女性紧密相关的被认为是泰山女儿的女神被创造出来的过程。<sup>②</sup>沙畹的另一名著《投龙》（1919）很可能受到了其对泰山研究的启发。该书主要是译注了关于中国古代投龙仪式的碑铭和道书等文献。其中，碑铭部分收入了记载公元8世纪至10世纪早期衡山、苏州林屋洞天、太湖水府等地的投龙告文，以及7世纪中期至14世纪初期记载泰山、济渎、大房山、云门山、麻姑山、华山、天坛、嵩山、终南山、衡山等地投龙仪式的碑文十一类，其中又以关于泰山投龙的文献所占比重为最。道书部分则为杜光庭的“宗教地理学专论”《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及科仪书《太上灵

<sup>①</sup> Édouard Chavannes, “Le Traité sur les sacrifices ‘Fong’ et ‘Chan’ de Se ma T’sien,” in *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 Péking: Typographie du Pei-T’ang, 1890.

<sup>②</sup> Édouard Chavannes, *Le T’ai chan, 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 Paris: Éditions Ernest Leroux, 1910.

宝玉匱明真大斋言功仪》。在结论部分，沙畹首先指出唐代道士/道姑的主要职责在于科演仪式。与佛教一样，这些仪式都是为了确保潜藏世界（le monde invisible）对皇帝、活人和亡魂的保护。然后，以唐代“才出现”的载有道教斋醮仪式的碑刻为引子，沙畹对目的和重要性各异的道教斋仪、醮仪进行了探讨。<sup>①</sup>

葛兰言师承莫斯和沙畹，是西方汉学的教父之一，也是西方首位对中国古典社会进行系统考察的学者，其研究视角即为社会学。葛氏的不少著述都讨论了古典社会中的宗教。其中，《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1919）的第二部分致力于“描述中国宗教中最古老的事实”，提出节庆中的官方仪式源于民间仪式，其圣地部分主要讨论了中国人的山川崇拜。葛兰言认为古代节庆是综合性的宗教活动，它们在后来被简化成仪礼，被不同系统的宗教思想纳于历法之中。《中国人的宗教》（1922）依次讨论了农民的宗教（乡村生活、圣地与农民节庆、古代信仰、民间神话与民俗）、封建主的宗教（贵族生活、对天的崇拜、农业神崇拜、祖先崇拜、神话）、官方宗教（指儒教：士人、玄学与正统伦理、崇拜与信仰）与新生宗教（道教与佛教）、近代中国的宗教情感。其中，对封建主的宗教及官方宗教的讨论指向帝国形式的全国统一的建立。《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1926）的主体有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被作为祭品牺牲的俘虏、首领及舞者，及其与政治威信的关系。第二部分通过考察被驱逐的神怪、假面舞蹈、仪式戏剧探讨了新秩序是如何建立的。第三部分通过考察周、商、夏这三个王朝建立者的牺牲精神及与之相关的舞蹈，讨论了王朝的建立问题。而《中国文明》（1929）与《中国人的思想》（1934）则基本是对以上研究的总结。值得一提的还有葛氏的四篇论文。《置婴于地：古老的仪式与神话式神判》（1922）以近代中国的溺婴为引子，对古代将女婴放置于地上的传统进行了探析。《悲痛的语言：基于古典中国丧葬仪式的讨论》（1922）考察了丧葬中的情感表达。《古道教刍议》（1925）主要讨论了禹步，此文再次显示了葛兰言敏锐的洞察力。《中国宗教的精神》（1929）认为中国人大体上是同时实践儒、释、道三教，其神明是一个将宗教活动作为实践秩序更甚于作为思想文化秩序的社会产物，并指出中国宗教是作为集体生活的功能而存在的。《中国的右和左》（1933）对中国人关于左与右的观念进行了结构性分析。

马伯乐的《近代中国的神话》（1928）依次考察了大众宗教与三教、无上之神、自然

---

<sup>①</sup> Édouard Chavannes, “Le jet des dragons,” in *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vol. 3, Paris: Éditions Ernest Leroux, 1919, pp. 53-220.

神、统治集团崇拜之神、行业神、个体崇拜之神以及彼世之神。《历史发展中的中国宗教》(1950)共有古代宗教、战国时期的宗教危机、道教、佛教和儒教等五章。其中,古代宗教一章讨论了中国古典社会中的宗教。马氏认为,古代的氏族是一种与始祖崇拜相联系的宗教单位;领地是基本的世俗组织,也是基本的宗教组织。领地的世俗社会以家族及其所拥有的封地为基础;而作为宗教社会基础的祖先崇拜与社神崇拜,则是世俗社会两个要素的神化呈现。在对祖先崇拜、社神崇拜的相关仪式进行分析之后,马氏指出在这种扮演着社会角色的、特定社会群体宗教生活的表达中,个人情感不占有任何位置。战国时期的宗教危机则探讨了上帝(天)与后土(地)崇拜的兴起,最后指出正是这两个崇拜分别孕育了后来的儒教与道教。此外,马氏还有一本专门的道教论集(1950)。

康德谟的论文《秦汉时期中国的宗教与政治》(1961)考察了秦始皇所用“皇帝”一词的神话、宗教及政治内涵,还探讨了天命的观念,它与作为王朝合法性工具的五行理论的关系及其对汉代政治的影响。此外,他还撰有《伏波将军》(1928)、《神圣之舞》(1963)、《中国古代的神圣》(1965)、《关于高媒崇拜的札记》(1966)、《中国宗教的神话学研究:迷宫与洞窟》(1967)、《中国古代的宗教师(maître spirituel)》(1983)、《中国古代的宗教》(1970)等文章。其中,《中国古代的宗教》讨论了商周时期的神话、神谕铭文、祖先及神明崇拜、人殉等,最后对秦汉帝国的崇拜与祭祀做了扼要的描述。

毕梅雪(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主要研究中国的考古与艺术。她的《死亡与死者:秦汉时期的实践与图像》考察了秦汉时期的墓葬实践及相关信仰,最后主要提出了两点结论。首先,宇宙观念的影响在东汉墓葬中凸显出来,如西王母的普遍崇拜就是宇宙观念影响增强的反映。其次,东汉时期普遍出现横穴墓。这种墓可以重新打开,以便埋葬别的死者或对死者进行定期祭拜。横穴墓也可能部分地源于一种被称为消除文的,可以防止生者和驱邪者被死者注为天帝使者的驱邪文书。根据消除文,人死之后,其魂、魄都各有不同的去处。毕梅雪认为这些消除文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末世论的关注,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对汉末华北与华中地区混乱的宗教焦虑。<sup>①</sup>

---

<sup>①</sup> 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 "Death and the dead: practices and images in the Qin and Han," in John Lagerwey and Marc Kalinowski (eds.), *Early Chinese Religion: Shang through Han (1250BC-220AD)*, Brill, 2009, pp. 949-1026. 本节讨论的以下几篇论文亦收入此书: Alain Thote, "Shang and Zhou funeral practices: interpretation of material vestiges," pp.103-142; Marc Kalinowski, "Diviners and astrologers under the Eastern Zhou: transmitted texts and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pp. 341-396; Jean Lévi, "The rite, the norm and the Dao: philosophy of sacrifice and transcendence of power in ancient China," pp. 645-692; Marianne Bujard, "State and local cults in Han religion," pp. 777-811.



考古学家杜德兰发表了多篇与古代中国人宗教观念关系紧密的论文，如《关于东周时期良渚文化面具遗绪的札记》（1996）、《中国文化中仪式用的青铜器》（1998）、《新近考古发现光芒下的楚王国墓葬实践：延续性与断裂性》（2000）、《东周时期统治者坟墓所见的墓葬实践》（2004）、《已知世界之外：呈现神明》（2006）、《楚王国的墓葬实践（中国中南，公元前四至三世纪）：从社会身份的呈现到个人命运的表达》（2007）、《商周的墓葬实践：物质遗迹的解释》（2008）等。其中，《商周的墓葬实践》论述了商周时期不断变化的墓葬实践及相关的信仰和观念。杜德兰认为，商朝王墓的规模和陪葬品显示了王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以及人类社会与诸神世界之间的特殊位置。他还指出，坟墓在当时也是祖先崇拜的重要场所。

马克对半宗教性质的占卜尤有研究，曾主编论文集《中古中国的占卜与社会》，共收入 10 篇论文，分别讨论天文气象占、历书、择吉、签占、梦占、符、杂占、诊治疾病占、相法、宅墓占等，多为法国学者所撰，其中氏著 3 篇。<sup>①</sup>他的《东周时期的占卜及占星术士：传世文献与新近考古发现》考察了《左传》中 132 则关于占卜的记载，并将之与当代发现的公元前 4 世纪楚地文书的记载进行比较，勾勒出了占卜术在东周时期的变化，并认为这些变化揭示了占卜术士与占星术士之间的宗教冲突。包山发现的公元前 4 世纪初楚地的占卜和祭祀记录则显示，与预知未来相比，占卜更主要的目的是决定祭祀的内容和对象。此外，马克还撰有《〈道藏〉中的占卜文献》（1989-1990）、《敦煌数占小考》（1991）、《敦煌数占》（1994）、《中国古代的神话、宇宙生成论及神谱》（1996）、《占卜、科学与宗教》（2001）、《敦煌文书中民间宗教与数术的互动》（2002）、《古代中国的技术传统与中国宗教中的数术文化》（2004）等论文。

乐唯主要是思想史家。他的《礼、名与道：中国古代的祭祀哲学与权力的至高无上》先将周朝的古老系统总结为通过祭祀来达成的社会的政治-宇宙结构化，这一系统在东周“礼崩乐坏”。以祭祀为中心的结构化、礼崩乐坏，以及随后出现的领土分部割据之间的张力，使得一种能够与更为抽象的时空相适应的新的宗教机制呼之欲出。文章标题中的“礼”、“名”与“道”则分别对应儒家、法家与道家。乐唯揭示了它们是如何从互相冲突，到战国末期融合在一起，并成为统一图景的。而这一图景就是作为新宗教机制的“道”。道在新哲学体系中的位置就像古代祭祀系统中天的位置，处于至高无上的中

---

<sup>①</sup> Marc Kalinowski (ed.), *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Études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03.

心，而新系统中的天子则与《庄子》中描述的一个道人很像。

吕敏的专著《中国古代的祭天：西汉时期的学说与实践》考察了汉初董仲舒等儒家给原本在前帝国时代旨在祭拜王族祖先、帝国初期旨在为皇帝祈求长寿的，范围限于王族/皇族之内的郊祀附加上祭天仪式，以建立新的国家宗教(*religion d'État*)基础的努力；另一方面，他们也致力于打击地方崇拜以及方士。他们的努力取得了部分成果，帝国祭祀的传统最终被创立，但所祭的并不是儒士的天，而是方士的太一；打压方士的效果也不理想，儒士与方士在之后的两千年中继续竞争，与之相应的则是官方崇拜与地方崇拜间的竞争。<sup>①</sup>吕氏的论文《汉代宗教中的国家与地方崇拜》则揭示了秦汉之间被低估的延续性，认为汉朝在一开始基本是借用了秦朝的国家宗教系统，除了出于宇宙哲学的考虑，在原来秦首都最重要的祭祀中供奉的四个上帝基础上，添祀了一个上帝，即被供奉于中心位置的黄帝。文章进而对汉代的祭祀学说和仪式实践，及其改革进行了论述。最终认为，这些改革看来都以经典为基础，并据此推出经典的地位与政治合法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吕氏的《陈宝崇拜》(1998)、《地方崇拜的庆祝与提升》(2000)都是考察神明崇拜的重要论文。

雷米·马蒂厄兴趣广泛，其治学范围涉及神话、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他译注了与中国古代宗教联系紧密的《穆天子传》(1979)、《搜神记》(主编，1992)、《淮南子》(主编，2003)、《楚辞》(2006)、《老子》(2008)等经典。在熟谙经典的基础之上，马氏撰有《中国古代的神话与人类学研究——〈山海经〉》(1983)、《中华帝国初期的神话与哲学——〈淮南子〉研究》(合编，1992)、《六朝中国文学中的鬼神与奇迹——千宝〈搜神记〉中的志怪及轶闻》(2000)等专著，以及《周末至汉初的巫：功能、仪式与本领(约公元前四世纪至约公元一世纪)》(2009)等论文。<sup>②</sup>

此外，高万桑的《中国的牛禁：农业、伦理与祭祀》第一部分对中国古代祭祀中的

---

<sup>①</sup> Marianne Bujard, *Le sacrifice au ciel dans la Chine ancienne: Théorie et pratique sous les Han Occidentaux* (Monographies / PEFEO, 187), Paris: EFEO, 2000.

<sup>②</sup> 马蒂厄(Rémi Mathieu)的研究性论著主要有：*Étude sur la mythologie et l'ethnologie de la Chine ancienne. Le Shanhai jing*, « Classique des Monts et des mers », Paris: IHEC, 1983 ; *Mythe et philosophie à l'aube de la Chine impériale. Études sur le Huainan zi*, coédité avec C. Le Blanc, Montréal-Paris, PUM-De Boccard éd., 1992 ; *Démons et merveilles dans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s Six Dynasties. Le fantastique et l'anecdotique dans le Sushen ji de Gan Bao*, Paris: You-Feng éd., 2000 ; “Les *wu*: fonctions, rites et pouvoirs, de la fin des Zhou au début des Han (env. Ve s. - env. Ier s.). Approche d'un chamanisme chinois,” in John Lagerwey (ed.), *Religion et société en Chin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Paris: Éditions du Cerf, 2009, pp. 277-304.

动物进行了探讨，第二部分则对其中的牛进行了专门考察。<sup>①</sup>劳格文的《中国：神州》探讨了《周礼》所见宗教体系与整个中国宗教、社会的紧密联系，也简要论述了周朝至秦汉时期的宗教。<sup>②</sup>目前任教于巴黎第十大学的李国强则发表了《古代中国商朝后期牛的祭祀与驯养》、《太牢考论》等论文。<sup>③</sup>

## 汉传佛教研究

法国的汉传佛教研究经历了 19 世纪中叶附属于印度佛教研究，到印度佛教研究大师与汉学大师合作，到 20 世纪初研究汉传佛教本身，再到 20 世纪中期汉传佛教典籍研究步入黄金时代的历程。其中，沙畹、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及其弟子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关于这段历史，郭丽英在 1998 年已作过系统的梳理。<sup>④</sup>因此，这里主要关注 1990 年代以来的情况。

戴思博，1974 年在巴黎第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和研究生院院长和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她主要关注汉唐时期不同宗教在技术、观念与信仰方面的相互作用及变化，以及六朝佛教与道教中关于身体的观念及个体的修炼实践，是一位在佛教、道教、医学等各方面均颇有建树的学者。她的一本论著就通过综合考察禅宗、道教与藏传佛教，对“悟”进行了探讨。<sup>⑤</sup>在佛教方面，戴氏主要是翻译《马祖语录》、《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典籍，主编《中古中国的佛教与文人》，以及涉及佛教的《中古中国的医学、宗教与社会》这两本论文集。<sup>⑥</sup>其中，《中古中国的佛

---

<sup>①</sup> Vincent Goossaert, *L'interdit du bœuf en Chine. Agriculture, éthique et sacrific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HEC, 2005.

<sup>②</sup> John Lagerwey, *China: A Religious Stat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17, 20-28.

<sup>③</sup> Li Guoqiang, “Sacrifices et domestication des bovins dans la Chine antique sous les Shang postérieurs (vers 1300 à 1046 avant J.-C.),” in *Anthropozoologica*, vol. 42(1), 2007, pp. 19-46; 〈太牢考论〉，收入马克、邓文宽、吕敏主编：《古罗马和秦汉中国——风马不相及乎》（《法国汉学》第 14 辑），2011，页 151-195.

<sup>④</sup> 详参郭丽英：〈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耿昇译，载《世界汉学》，1998 年第 1 期，页 115-121。

<sup>⑤</sup> Catherine Despeux, *Le chemin de l'éveil, illustré par le dressage du buffle dans le bouddhisme Chan, le dressage du cheval dans le taoïsme, et le dressage de l'éléphant dans le bouddhisme tibétain* 禅宗牧牛图、道教牧马图与藏传佛教牧象图所揭示的“悟”之道, Paris: Éditions l'Asiathèque, 1981.

<sup>⑥</sup> Catherine Despeux (ed.), *Bouddhisme et lettrés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Paris-Louvain: Éditions Peeters, 2002; *Médecine, relig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Études de manuscrit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 Paris: IHEC/Collège de France, 2010.

教与文人》收有其论文《作为佛教辩护工具的士人文化：道安的〈二教论〉》。她还撰文讨论牛头禅宗，并翻译相关文献。<sup>①</sup>她一篇考察个人修炼如何入圣的文章，和另一篇考察公元3世纪到6世纪宗教实践的文章都同时讨论了佛教和道教。<sup>②</sup>

郭丽英于1970年代初求学日本，以借助梵文文本对《文殊说般若经》的两个译本作比较研究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她先后在日本、美国和法国工作和学习。1994年，她成为敦煌写本研究组的一员，并在其中主持汉文伪经研究小组。她的主要兴趣在于汉传佛教的传播及其地方适应。其博士论文揭示了中国僧人如何改造源于印度的佛教忏仪，却又从印度哲学中寻求其合法性的过程。这些忏仪不仅传布于中国各地，也在朝鲜和日本得到发展。<sup>③</sup>对汉传佛教在中国邻国发展的考察，同样也见于其另外两篇文章。<sup>④</sup>郭氏认为，汉传佛教的思想与观念原来继承自印度佛教，但已经有深刻的革新，尤其在仪式方面。只有将其与印度佛教，以及相关的藏传佛教文本与仪式进行比较，方能体察这些变化。在汉文伪经在朝鲜、日本的传播的研究方面，亦是如此。得益于其在敦煌写本研究组的工作及1990年代因工作再度前往日本期间发现名古屋七寺所藏丰富的佛教文献，郭氏主要开展两方面的研究。其一，研究名古屋七寺所藏5至6世纪古逸佛教伪经。其二，研究10世纪敦煌文献中那些被认为是密教伪经的仪式文本。<sup>⑤</sup>在此基础上，她又对5至10世纪汉文佛教“伪”字在佛道辩论中的使用，及其与全国性佛藏的关系作了进一

---

① Catherine Despeux, “L’école tch’an de Nieou-t’eu 牛头禅宗”; “Nieou-t’eu Fa-jong 牛头法融”; “Extinction de la contemplation 绝观论”; “L’inscription de l’esprit 心铭,” in *Tch’an (Zen). Racines et floraisons* 禅宗的起源及其兴盛, Paris: Les Deux Océans, 1985, pp. 103-125, 125-136, 126-155, 156-164.

② Catherine Despeux, “L’accès au sacré par la méditation. Techniques bouddhiques et taoïstes 由冥想而入圣境：佛道之术,” in Michel Masson (ed.)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s Instituts Ricci de Paris et Taipei, *Le sacré en Chine*, Turnhout: Brepols, 2008, pp. 129-144; “Pratiques bouddhiques et taoïques du IIIe au VIe siècle (221-581) 三至六世纪的佛教与道教实践,” in *Religion et société en Chin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pp. 643-684.

③ Kuo Liying, *Confession et contrition dans le bouddhisme chinois du Ve au Xe siècle* 五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忏悔经文与忏仪 (Monographies / PEFEO, 170), Paris: EFEO, 1994. 其博士论文准备期间的工作也见于 “Un texte ancien de vœux et de confession, P. 2189, le ‘Vœu de la Capitale de l’Est’,” in *Les peintures murales et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Paris: Éditions de la Fondation Singer-Polignac, pp. 111-120 (此文后由耿昇译成中文收入谢和耐、苏远鸣等著：《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粹》，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105-119）。1994年的一篇论文也讨论了佛教的忏悔仪式：“La confession dans le bouddhisme mahayanique: théories et pratiques 大乘佛教中的忏悔理论及其实践,” in *Enquêtes sur le Bouddhisme (La pensée et les hommes*, Nouvelle série 25), Bruxelles: Édi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1994, pp. 17-26.

④ 郭丽英：《〈占察经〉研究》，耿昇译，载《法国汉学》，第2辑，1997，页193-223；“La récitation des noms de buddha en Chine et au Japon 中国与日本的佛名念诵,” in *T’oung Pao*, vol. 81, 1995, pp. 230-268.

⑤ Kuo Liying, “Mandala et rituel de confession à Dunhuang 敦煌文献所见的曼荼罗和忏仪,” in *BEFEO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85, 1998, pp. 227-256; 《敦煌汉传密教经典研究：以〈金刚峻经〉为例》，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2004，页327-337。

步探讨。<sup>①</sup>此外，郭氏也对佛教石幢铭文进行过专门考察。<sup>②</sup>

王微早先在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和巴黎第十大学学习梵文两年，1984 年又获得中文硕士学位、藏语高等文凭和泰米尔语同等学力文凭，并于次年获得中国研究深入研究文凭。1989 年，她进入敦煌写本研究组。她还多次前往印度和中国（包括西藏）进行考察。她的博士论文探讨了 6 至 13 世纪中国的地藏信仰。<sup>③</sup>王氏对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都颇有研究。首先，和其在敦煌写本研究组的工作相关，她最初主要着力于汉传佛教，尤其是汉文佛教伪经研究。<sup>④</sup>不过，其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了藏传佛教，尤以近年对乾隆墓葬的研究令人瞩目。<sup>⑤</sup>对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研究自然也使王微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其进行考察。例如，其对白伞盖佛母，对清代《汉区佛教源流记》的作者贡布嘉（mGgon-po-skyabs），对 20 世纪初译介藏传佛教经典的汉传佛教法师法尊的研究等。<sup>⑥</sup>

<sup>①</sup> Kuo Liying, “Sur les apocryphes bouddhiques chinois 论汉文佛教伪经,” in *BEFEO*, vol. 87, 2000, pp. 677-705.

<sup>②</sup> Kuo Liying, “Inscriptions on ‘Stone Banners’ (*shichuang* 石幢): Text and context,” 收入高田时雄编：《中国石刻文献：整理工作与研究视角（会议论文集）》，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6，页 37-51。

<sup>③</sup> Françoise Wang-Toutain, *Le bodhisattva Ksitigarbha en Chine. VI<sup>e</sup> siècle au XIII<sup>e</sup> siècle* 六至十三世纪中国的地藏菩萨 (Monographies / PEFEO, 185), Paris: EFEO, 1998.

<sup>④</sup> Françoise Wang-Toutain, “Une peinture de Dunhuang conservée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幅敦煌画像,” in *Arts asiatiques*, vol. 49, 1994, pp. 53-69; “Le bol du Buddha. Propagation du bouddhisme et légitimité politique 佛之钵：佛教传播与政治合法性,” in *BEFEO*, vol. 81, pp. 59-82; “Le sacre du printemps : les cérémonies bouddhiques du 8<sup>e</sup> jour du 2<sup>e</sup> mois 春祭——二月八日节的佛教仪式,” in Jean-Pierre Drège (ed.), *De Dunhuang au Japon, Études chinoises et bouddhiques offertes à Michel Soyminé*, Genève: Droz, 1996, pp. 73-92 (此文中文译本参见《法国汉学》第 5 辑，页 107-126)；“Pas de boissons alcoolisées, pas de viande: une particularité du bouddhisme chinois vue à travers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in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 11, 1999-2000, pp. 91-128.

<sup>⑤</sup> Françoise Wang-Toutain, “Le Sutra qui sauve des maladies. Un aspect peu connu de Vajrapani, Protecteur de la Loi 《救疾经》：护法神金刚力士鲜为人知的一面,” in Jean-Pierre Drège avec Olivier Venture (eds.), *Études de Dunhuang et Turfan*, Genève: Droz, 2007, pp. 99-128; 〈乾隆裕陵棺槨藏文经咒释读〉，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 1 期，页 48-65；〈乾隆葬礼与藏传佛教〉，收入谢继胜、沈卫荣、廖旻 主编：《汉藏佛教艺术研究——第二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页 130-169；〈乾隆墓梵文写本中的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Dharanis*）〉，收入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 3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页 343-373。

<sup>⑥</sup> 王微：〈白伞盖佛母：汉藏佛教的互动〉，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 5 期，页 98-152；“Circulation du savoir entre la Chine, la Mongolie et le Tibet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Le prince mGon-po skyabs 十八世纪汉、蒙、藏之间的知识流通：贡布嘉王子,” in *Études chinoises*, vol. 25, Paris: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Études Chinoises, 2005, pp. 57-112; “Quand les maîtres chinois s'éveillent au bouddhisme tibétain 汉传佛教法师体悟藏传佛教时,” in *BEFEO*, vol. 87, 2000, pp. 707-727; “Une représentation sino-tibétaine du bodhisattva Ksitigarbha. Étude d'une illustration du ‘Tétraglotte’ conservé au Musée Guimet 地藏王菩萨的汉藏画像,” in *Arts asiatiques*, vol. 62, 2007, pp. 140-145; “Comment Asaṅga rencontra Maitreya. Contact entre bouddhisme chinois et tibétain au XX<sup>e</sup> siècle 无著菩萨与弥勒菩萨如何相斗：二十世纪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间的关系,” in Monica Esposito (ed.), *Images du Tibet au XIX<sup>e</sup>-XX<sup>e</sup> siècle - Images of Tibet in 19th 20th centuries*, Paris: EFEO, 2008,

专攻日本天台宗的罗禅能是研究《法华经》的专家，对古代汉文《法华经》及注释的翻译是其研究主题之一。罗禅能的一个学生田水晶（Daniela Campo）于 2011 年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毕业。她的博士论文题为《虚云禅师（约 1864-1959）：其作品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中的角色》，主要通过考察虚云禅师的传记来讨论历史编纂与圣徒传记书写之间的张力。

何玉惟于 2003 年在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其博士论文主要考察了鸠摩罗什的生活及其佛经翻译。<sup>①</sup>何氏目前任教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主要从事六朝佛教文献和仪式研究，考察僧人与国家、社会间关系等，已经发表《六朝的佛教徒网络：佛教的捍卫与传播》、《从吉藏对〈维摩诘经〉第九章的注看其“不二”观念》、《中古中国佛教辩论中反宗教权力主题的出现》、《关于斋日的讲道与翻译：鸠摩罗什在印度仪式的中国适应中扮演的角色》、《翻译、伪经与佛藏的出现》、《佛教仪式》等论文。<sup>②</sup>

除了郭丽英和何玉惟，穆瑞明（详见道教相关部分）和方玲也对伪经进行了考察。方玲通过分析敦煌本《佛说救疾经》、《佛说咒媚经》、《新菩萨经》、《劝善经》等伪经，主要讨论了中古中国关于疾病与治疗的观念。<sup>③</sup>

曾经在俄国从事多年敦煌吐鲁番佛教艺术收藏品研究的张惠明，2011 年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答辩通过了其博士论文《中古中国文殊五台山图像学：根据公元七至十世纪的敦煌绘画资料的研究》。该研究以敦煌的绘画图像为基本资料，结合大量的文本资料，对中古时期（公元 5 至 10 世纪）文殊菩萨和五台山图像在中国的出现、发展和演变的

---

pp. 359-385.

<sup>①</sup> Sylvie Hureau, “Kumārajīva (env. 344-413), conseiller des princes, traducteur et instigateur d’une orthodoxie bouddhique en Chine 鸠摩罗什（约 344-413）：中国的王子顾问、佛经翻译家和一种佛教正统性的挑动者,” PhD dissertation, Paris : Institut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2003.

<sup>②</sup> Sylvie Hureau, “Réseaux de bouddhistes des Six Dynasties: défense et propagation du bouddhisme”; “Réflexions de Jizang sur la non dualité, d’après ses commentaires du neuvième chapitre du *Soutra de Vimalakīrti*,” in *Bouddhisme et lettrés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pp. 45-65, 301-318; “L’apparition de thèmes anticléricaux dans la polémique bouddhique médiévale,” in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vol. 24, 2002, pp. 17-29; “Preaching and translating on pos-adha days: Kumārajīva’s role in adaptating an Indian ceremony to China,” i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Postgraduate Buddhist Studies* 10, Tokyo, 2006, pp. 86-118; “Production et dissémination de textes bouddhiques, traductions et apocryphes,” “Les rites bouddhistes,” in *Religion et société en Chin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pp. 429-258, 493-529, 这两篇文章的英文版参见 John Lagerwey and Lü Pengzhi(eds.), *Early Chinese Religion Part II. The Period of Division (220-589 AD)*, Leiden: Brill, pp. 741-774, 1207-1244.

<sup>③</sup> Fang Ling, “Sûtras apocryphes et maladie 伪经与疾病,” in *Médecine, relig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Études de manuscrit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 pp. 953-989.

历史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整体的研究方法上，她的分析论证力图摆脱佛经文本的局限，更多地关注与图像有关的发生于中国内地与敦煌本地的各种佛事活动的文本文献，将不同风格样式的图像作品放回其产生的宗教与文化艺术的具体环境背景中进行了考察，并着力于开放性、多方位和多视角地探索有关图像样式和风格中所包含的来自不同地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涵义。

戴文琛善于从古代小说中发现各种宗教主题。他的《东度记：一部十七世纪通俗小说中的达摩教化之旅》考察了 1635 年刊刻于苏州的《东度记》。《东度记》中，达摩常作为禅宗祖师出现，也兼具崇奉儒家伦理的圣者等身份。作者通过细致地分析其文本来源、影响及版本的形成过程，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叙事书写在近代前夜的中国所扮演的社会、文化和宗教角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sup>①</sup>戴氏的《被想往者、被取笑者与被改正者：十六至十八世纪通俗小说中误入歧途的僧人》（2002）、《一个被呈现于纸上的僧人无休止的忠告：一部十七世纪通俗小说中作为儒家宣教者的达摩》（2008）等文章也通过分析通俗小说对宗教进行了讨论。

已经移居美国的伯兰特·佛尔（Bernard Faure）则主要以其对早期禅宗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瞩目。佛尔于 1978-1983 年间求学日本，师从柳田圣山先生治禅宗。1984 年，佛尔毕业于巴黎第七大学，获得国家哲学博士学位，导师为谢和耐。除了扎实的文献功底，他还善于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分野。其所提的“方法论之多神教”就是针对宗教史学、东方学、社会学或宗教人类学等学科各自画地为牢的情况而提出的。佛尔是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他最有名的论著则莫过于其对禅学的三大“批判”。<sup>②</sup>第一种是 1988 年出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之上修改而成的《中国佛教中的正统性意欲》。这本书主要将传统禅学界的不同思想倾向置于政治-宗教（political-religious）的语境中进行分析，颠覆了禅学界历来褒南贬北的倾向。《顿之修辞：中国禅/日本禅之文化批判》对禅的分析是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中展开的。《禅的洞见与溢见：禅传统的认识论批判》一书则着重应用系谱学的方法，重新检讨了与北宗研究有关的各种材料和结论。<sup>③</sup>不过，

---

<sup>①</sup> Vincent Durand-Dastès, *La Conversion de l'Orient: Un périple didactique de Bodhidharma dans un roman chinois en langue vulgaire du XVII<sup>e</sup> siècle*,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2008.

<sup>②</sup> 更详尽的介绍请参见龚隽：〈中译序〉，收入佛尔：《正统性的意欲：北宗禅之批判系谱》，蒋海怒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 1-8。

<sup>③</sup> Bernard Faure, *La volonté d'orthodoxie dans le bouddhisme chinois* 中国佛教中的正统性意欲, Presses du CNRS, 1988 (此书在 1997 年被译成英文，到 2010 年则有中文译本，参见上一条注); *The rhetoric of immediacy: A cultural critique of Chan/Zen Buddh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

也有人认为佛尔过度地运用了西方的理论资源，其研究的结论也有待商榷。

梅谦立（Thierry Meynard）的《梁漱溟的宗教哲学：隐匿的佛教徒》则从哲学角度对“最后的儒家”的另一个身份——自学成才的佛教徒进行了考察。<sup>①</sup>梅氏于2003年获得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书应该是在其博士论文《梁漱溟的宗教观》的基础上写成的。该书被认为是自陈荣捷的《现代中国宗教趋向》（1952）以来探讨1949年以前中国主要思想家们的宗教观的又一次难得的尝试。<sup>②</sup>

在法国本土，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汉传佛教的趋势也日益凸显。其中，最突出的学者当为皮卡尔和华裔学者汲喆。皮卡尔主要研究中国音乐，在中国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最近，他于1990年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在修订之后2012年以《普庵祖师神咒：中国音乐中梵语拼字表之化身》为题出版。<sup>③</sup>该书结合了中国佛教史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将《普庵祖师神咒》置于仪式/半仪式、宗教/伪宗教的语境之中进行分析，集中考察了其从一开始的梵语拼字表到咒语，再到琴曲的演变过程。此外，皮卡尔还发表了《名、物与用：佛教唱赞文断句的磬》（1994）等讨论佛教音乐的文章。汲喆早年曾翻译数种法国社会学经典，后来前往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师从宗教社会学家爱尔维优-雷杰（Danielle Hervieu-Léger）学习社会学。其博士论文在华北、台湾、法国三地田野的基础之上，从制度、教义、集体实践和僧俗关系四个维度考察了佛教在面对近现代挑战时的转变。此论文曾获2008年度法国宗教社会科学协会优秀博士论文奖。汲喆的研究涉及面颇广，就佛教而言，他主要关注当代中国大陆的佛教复兴，已经发表《国家与佛教的新关系》（2004）、《重构的记忆：一座佛寺在重建中的记忆策略》（2007）、《宗教、青少年与现代性：夏令营——中国佛教的新型仪式》（2011）、《作为社会力量的中国佛教：三十年复兴的现实与潜力》（2013）等一系列论文。他与高万桑为国际宗教社会学协会的季刊《社会罗盘》主编的“中国佛教复兴的社会意涵”专号，<sup>④</sup>应该是

---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Chan tra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p>①</sup> Thierry Meynard, *The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Liang Shuming: The hidden buddhist*, Brill, 2011.

<sup>②</sup> 马远程（Michel Masson）：〈评论：梅谦立，《梁漱溟的宗教哲学：隐匿的佛教徒》〉，载《神州交流》，第8卷第4期，2011。

<sup>③</sup> François Picard, *L'Incantation du patriarche Pu'an 普庵祖师神咒. Les avatars du syllabaire sanskrit dans la musique chinoise*, Leuven: Peeter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2012.

<sup>④</sup> Ji Zhe and Vincent Goossaert (dir.), “Social Implications of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special issue of *Social Compass*, vol. 58, no. 4, 2011.



西方学界第一本完全关注当代中国佛教的论文集。

### 藏传佛教及西藏原生宗教研究<sup>①</sup>

20 世纪初伯希和运回巴黎的敦煌写本、西域文书和文物为法国藏学研究开创了条件，因为在这些文献中，有 2000 多卷敦煌藏文写本及西域其它地方发掘到的藏文文书。对藏传佛教的专论则可追溯到早期藏学研究的代表人物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 1877-1965）。与这一时期大部分的藏学家不同，巴科不但是历史学家也是人类学家。他曾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考察，例如其对多克拉的朝圣以及西藏寺院戏曲表演的考察等。<sup>②</sup>他主要根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所撰《西藏史引论》的第二章专门讨论了西藏佛教与神权政体的发展。<sup>③</sup>《佛陀》只有一章是对佛陀的历时性考察，其余部分则讨论佛教创立的各种相关传说。<sup>④</sup>他的其它著述则有《西藏边境：以多克拉为中心》（1909）、《西藏艺术》（1911）等专书以及《西藏的人类学研究：西藏东南的居民》（1908）、《西藏东部的居民》（1912）等论文。

藏学大师拉露（Marcelle Lalou 1890-1967）师承印度学家和佛教学家列维（Sylvain Lévi）、佛教学家普祖鲁斯基（Jean Przyluski），与巴科则亦师亦友，其重要贡献之一是编写了《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清册》三卷，均由法国国家图书馆出版。<sup>⑤</sup>此目录至今仍是研究敦煌藏文写本的必备工具书。在宗教研究方面，她以苯波教文献为主撰有专著《西藏宗教》，<sup>⑥</sup>重要论文则有《丹珠尔中的藏文〈宝积经〉》（1927）、《藏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929）、《论佛教巫术》（1932）、《论佛教绘画的三个方面》（1935）、《民间叙事与佛教故事》（1936）、《〈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与〈陀罗根本仪轨经〉》（1936）、《那伽

---

<sup>①</sup> 本节的梳理主要参考了耿昇：《法国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收入郑炳林主编、耿昇译：《法国藏学研究精粹》，第 1 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页 1-37。具体译名方面，笔者已经逐一校正。

<sup>②</sup> Jaques Bacot, “Le Pèlerinage du Dokerla (Tibet sudoriental) 多克拉的朝圣(西藏东南部),” in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vol. 32, 1909, pp. 195-218; *Représentations théâtrales dans les monastères du Tibet. Trois mystères tibétains: Tchimekundan-Djroazanmo-Nansal* 西藏寺院里的戏曲表演——三部西藏神秘剧, Paris: Édition L’Asiathèque, 1921 (该书在 1923、1924 年由伦敦的 G. Routledge and Sons 出了英文版)。

<sup>③</sup> Jaques Bacot,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Tibet*, Paris: Société Asiatique, 1962.

<sup>④</sup> Jaques Bacot, *Le Bouddha*,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7.

<sup>⑤</sup> Marcelle Lalou,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Pelliot ibétain no. 1-849), Paris, 1939; Tome II (no. 850-1282), Paris, 1950; Tome III (no. 1283-2216), Paris, 1961.

<sup>⑥</sup> Marcelle Lalou, *Les religions du Tibet*,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7.

崇拜与治疗》(1938)、《有关中国禅宗发展的藏文文献》(1939)、《高地亚洲信仰中的亡灵之路》(1949)、《王室葬礼中的苯波教仪轨》(1952)、《禁咒藏研究》(1955)、《领地、毒药与医治者》(对敦煌文献中一种苯波教文本的译注, 1958)《菩萨经〈法王〉》(1961)、《敦煌藏文〈十万颂般若波罗蜜经〉写本》(1964)等。

麦克唐纳(Ariane Macdonald)夫人师承拉露。1962年,她在巴黎出版了《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第二、第三章的译注本,并将藏文原文附在里面。麦氏在书中依次考察了《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的起源、撰写,及其所载关于设立曼荼罗的仪轨。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鲜有人注意的领域。同年发表的《关于四天子理论在吐蕃传播的札记》认为玄奘及其弟子翻译的经文对吐蕃和西域都具有直接影响。麦氏在1967年编译了两份跟尸体有关的藏文写本,在1970年则发表了《驮那羯磔迦国塔》。<sup>①</sup>1971年,她的一篇论文在巴科等人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基础上,进一步解读文献,考察了松赞干布时期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篇论文后来由耿昇译成中文单独成书,即《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

②

日裔法国学者今枝由郎的《生死轮回史》主要是译注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八种相关敦煌藏文写本,最终认为这个故事是对须大拿(诺桑王子)朝圣故事的改编。<sup>③</sup>他还发表了《〈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第一章》(概括性翻译, 1977)、《基于汉文文献的送老工夹布仪式札记》(1978)、《关于六字大明神咒(Om mani padme hūm)的初步札记》(1979)、《敦煌藏文写本中的〈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摘录本一种》(1981)、《〈德格版丹珠尔〉札记》(1981)、《有关佛教禅宗(Bouddhisme du Dhyāna)的

---

<sup>①</sup> Ariane Macdonald, *Le mandala du Manjuśrīmulakalpa* 《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中的曼荼罗仪轨, Paris: Andrien-Maisonneuve, 1962; *Édition et traduction de deux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s "Histoires du cadavre"* 两份关于“尸身历史”的藏文写本编译, Coll.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7; “Note sur la diffusion de la ‘Théorie des Quatre fils du Ciel’ au Tibet,” in *Journal Asiatique*, vol. 250, 1962, pp. 531-248; “Le Dhānyakataka de Man-luns gurut,” in *BEFEO*, vol. 57, 1970, pp. 169-213.

<sup>②</sup> Jaques Bacot, Frederick William Thomas, Gustave Charles Toussaint,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Bibliothèque d'études*, tome 51),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40 (已出王尧、陈晓译注增订本,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2); Ariane Macdonald, “Une lecture des P. T. 1286, 1287, 1038, 1047 et 1290. Essai sur la formation et l'emploi des mythes politiques dans la religion royale de Sron-bcan sgam-po 1286、1287、1038、1047 和 1290 号伯希和藏文写本解读: 松赞干布王朝宗教中政治性神话的形成及运用,” in Ariane Macdonald (ed.), *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 Paris: Andrien-Maisonneuve, 1971, pp. 190-391 (这篇长文已由耿昇译成中文独立成书,《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1)。

<sup>③</sup> Yoshiro Imaeda, *Histoire du cycle de la naissance et de la mort. Étude d'un texte tibétain de Touen-houang*, (Hautes Études Orientales, 15), Genève/Paris: Droz, 1981.

敦煌藏文写本研究》(1981)、《关于伯希和 999 号藏文写本》(1998) 等文章。今枝由郎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与库洛伊(H. K. Kuloy)合作编辑出版了《藏学研究目录》。这个系列的目录至今仍是从事西藏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其中很多都与宗教直接相关,如《有关吐蕃僧诤会的敦煌藏文写本》(今枝由郎撰,1975)、《对藏文本〈丹珠尔〉和汉文本〈丹珠尔〉的整理》(1977)等。<sup>①</sup>

和很多地区一样,西藏的宗教具有多元性。这自然也反映到传世文献当中。法国首位系统阐述西藏宗教多元性的应该是最权威的藏学家石泰安。1962年,石泰安在其名著《西藏的文明》中对教权的形成、喇嘛教派、喇嘛教、苯教及其所称的“无名宗教”等论题分别做了专论。<sup>②</sup>之后,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不仅探讨藏传佛教,也考察苯教和西藏其它原生宗教(religion indigène)。<sup>③</sup>其中,1985年发表的《论祖拉与原生宗教》主要针对麦克唐纳夫人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提出不同观点。麦克唐纳夫人在此书中对吐蕃佛教之前的宗教提出了全新的看法,认为不应该将吐蕃古代宗教称为“苯教”,提出吐蕃赞普主要崇拜神山,“祖拉”才是吐蕃佛教之前的宗教,而且其中有汉族观念的影响。这本论著因打破学界对吐蕃佛教之前的古代宗教的全部观念,且所提问题成为近年法国敦煌藏文写本研究的核心关注点而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麦氏关于“祖拉”(gcug-lag)辞义的观点遭到石泰安的反驳。她在很多敦煌吐蕃文书的断代和诠释也和石泰安有很大的分歧。此外,卡蒂亚·毕夫特里耶的《安多“神灵身份”的问题:止噶域拉(Khri kav yul lha)还是文昌,藏区地方神还是汉人的文教神》(2000、2002)、《娱乐与仪式/娱乐如何能成为仪式:安多热贡的六月会》(2004)、《灵媒刍议:以安多 Sog ru 村六月会的 lha pa 为例》(2008);拉谢尔·吉多尼的《拉萨古老的送老工夹布仪式》(1998)等文章也显示了西藏地区宗教的多元性。

<sup>①</sup> 关于今枝由郎与库洛伊所编《藏学研究目录》,详参耿昇:《法国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页 20-22。

<sup>②</sup> Rolf A. Stein, *La civilisation tibétaine*, Paris: Dunod, 1962 (已出耿昇中译本,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sup>③</sup> Rolf A. Stein, “Un document ancien relatif aux rites funéraires des Bon-po tibétains 有关西藏苯波教丧葬仪式的一份古文书,” in *Journal Asiatique*, vol. 258, 1970, pp. 155-185; “Du récit au rituel dans l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从敦煌藏文写本看叙事到仪式的转变,” in *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 pp. 479-547; “À propos du mot *geug-lag* et de la religion indigène 论祖拉与原生宗教,” in *BEFEO*, vol. 74, 1985, pp. 83-133; “La tradition relative au début du bouddhisme au Tibet 西藏佛教早期的相关传统,” in *BEFEO*, vol. 75, 1986, pp. 169-196; “Un genre particulier d’exposés du tantrisme ancien tibétain et khotanais 一种关于古代西藏和于阗密宗的特殊报告,” in *Journal Asiatique*, vol. 275, 1987, pp. 265-282; “La religion indigène et les *bon-po* dan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敦煌写本中的原生宗教和苯教,” in *BEFEO*, vol. 77, 1988, pp. 27-56.

除了石泰安和麦克唐纳夫人，苯教研究方面主要还有布隆多、噶尔美和让-吕克·阿沙尔等学者。布隆多主要考察莲花生传的形成和“掘藏师”的作用、宁玛巴和苯教徒，以及研究法师们的仪轨文书。她对《莲花生传》和苯教徒的研究如《根据西藏传说对莲花生所作的分析：史料分类》（1980）、《〈十万宝诰〉中的掘藏师是苯教徒吗？》（1984）、《钦则旺布：根据〈苯教密咒〉传说写成的〈莲花生传〉及其史料来源》（1985）；对苯教仪式的研究如《由将苯教仪轨书纳入〈掘藏大宝〉所引起的争论》（1988）、《巨角鹿概论》（与噶尔美合撰，1988）、《垛仪的基本问题》（1990）、《〈虚空秘密垛仪轨〉：几个关于仪式结构和宇宙观的问题》（2000）等。当然，她也研究藏传佛教和民间仪式。<sup>①</sup>噶尔美擅长研究西藏的涤罪仪式，也对藏传佛教的神话和仪轨感兴趣。他著有《〈嘉言宝库〉——苯教史》（《伦敦东方丛书》第26卷）、《箭与锤：西藏的历史、神话与信仰研究》、《苯教研究的新视野》（合著）、《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苯波教寺院调查》（合著）和《苯教：法术的世界——西藏原生宗教》（合著）等专书，还发表了《苯教历史与教理综述》（1975）、《苯教的三种宗教舞蹈》（1986）等论文，编有《苯教著述目录》（1977）。<sup>②</sup>其中，《箭与锤》除了考察苯教，也对地方崇拜和佛教仪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让-吕克·阿沙尔则主要考察宁玛巴传统的《十七续》和各种《心髓》，以及与苯教紧密联系的《象雄耳传》和其它相关文献，致力于从哲学和教义，亦即理论和实践这两个层面研究大圆满传统的历史和教义特点，如其在宁玛巴和苯教中的发展，及其神话起源等。苯教方面，他已出版《苯教伏藏》（2004）等专著，并发表了《贡珠扎巴与〈空行秘密风脉〉的发现：关于十八世纪新苯教传统发展的考察》（2005）等一系列的论文。此外，西藏

<sup>①</sup> Anne-Marie Blondeau, “Bya-rung kha-shor, légende fondatrice du bouddhisme tibétain 贾戎喀学尔塔：藏传佛教的创始传说,” in P. Kvaerne (ed.),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vol. I, Oslo: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1994, pp. 31-48; “Défense de Tsong kha pa: à propos d’un texte polémique attribué à mKhas grub rje 宗喀巴的辩护：关于一份被认为是克珠杰·格勒巴桑撰写的论战文书,” in Helmut Krasser, Michael Torsten Much, Ernst Steinkellner and Helmut Tauscher (ed.),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Graz, 1995)*, vol. I,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7, pp. 59-76.; “Que notre enfant revienne! Un rituel méconnu pour les enfants morts en bas âge 孩子，回来吧！一种鲜为人知的为夭折者举行的仪式,” in S. G. Karmay and P. Sagant (eds.), *Les habitants du toit du monde. Études recueillies en hommage à Alexander W. Macdonald*, Nanterre: Société d’Ethnologie, 1997, pp. 193-220.

<sup>②</sup> Samten G. Karmay, *The treasury of good sayings: a Tibetan history of B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The arrow and the spindle: Studies in history, myths, rituals and Beliefs in Tibet*, Kathmandu: Mandala Book, 1988; *New horizons in Bon studies*, co-authored with Yasuhiko Nagano 长野太彦,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0; *A Survey of Bonpo Monasteries and Temples in Tibet and the Himalaya*, co-authored with Yasuhiko Nagano,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3; *Bon: The magic word: The indigenous religion of Tibet*, co-authored with Jeff Watt, London: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2007.

宗教专家图散（Charles Toussaint）也翻译过与苯教关系密切的《莲花生遗教》（1933）。

对大圆满的专门考察则有噶尔美的《大圆满：藏传佛教中的哲学和冥想之教》；<sup>①</sup>让-吕克·阿沙尔的专著《奥义之精要：宁玛巴传统中大圆满起源的哲学和历史学研究》（1999），<sup>②</sup>以及《大圆满传统中的基础及其七种解释》（2002）、《尚顿·扎西多杰（1097-1167）与大圆满〈心髓〉的延续》（2006）、《大圆满（rDzogs chen）还是无上瑜伽（Atiyoga）：大圆满的西藏传统》（2008）、《体悟无知——大圆满中的漂泊观念》（2008）、《使大圆满之道享有盛誉的夏察仁波切彩虹身》（2010）等论文。<sup>③</sup>

马修·卡普斯坦精通梵语和藏语，同时也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他主要研究印度和西藏佛教思想史，尤其是密宗和象征仪式系统，宗教在西藏文化和政治中的角色以及汉藏之间的宗教交流。卡普斯坦已出版专著《佛教的西藏同化：改宗、论争与记忆》、《理性之迹：印度和西藏佛教思想中的认同与阐释》，主编了《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合编）、《光的存在：神圣光辉与宗教体验》等，还撰有《香巴噶举派：一个不为人所知的藏传佛教教派》（1980）、《De-ga gyu-tshal（榆林窟）之会盟寺的比定与图像》（2004）、《雪地里的目连与地狱中的格萨尔王：一则汉人关于母亲死亡的传说及其西藏变体》（2007）等一系列的论文。<sup>④</sup>

利用敦煌和西域文书研究西藏宗教是法国藏学历来的传统。不过，早在20世纪早期就已经有人独辟蹊径。她就是传奇的探险家大卫·尼尔（Alexandra David-Néel 1868-1969）。她曾先后四次前往中国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和西藏进行考察。在这些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大卫·尼尔共写过26部著作和数量惊人的论文。其中，不少是讨论藏传佛教的，如《西藏的神秘主义和巫师》（1929）、《喇嘛教度礼》（1930）、《五智喇嘛》（1935）、《藏传佛教的秘密传授》（1951）、《西藏末利佛经典》（1952）、《云丹嘉措喇嘛》（1954）等。

---

<sup>①</sup> Samten G. Karmay, *The Great Perfection (rDzogs chen in Tibetan), A philosophical and meditative teaching of Tibetan Buddhism*, Brill, 1988, 2007.

<sup>②</sup> Jean-Luc Achard, *L'Essence Perdue du Secret - Recherches phil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origine de la Grande Perfection dans la tradition rNying ma pa*, Turnhout: Brepols, 1999.

<sup>③</sup> 让-吕克·阿沙尔和马修·卡普斯坦的著述都很多，但受语言能力的限制（笔者不会藏文），本文只列出了代表性部分。有兴趣的读者可登录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的网站作进一步了解。

<sup>④</sup> Matthew T. Kapstein, *The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Conversion, contestation and mem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Reason's traces: Ident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Indian and Tibetan buddhist thought*,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1. Melvyn C. Goldstein and Matthew T. Kapstein (eds.),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Religious reviv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Matthew T. Kapstein (ed.), *The Presence of Light: Divine Radiance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她的《永生与转世：中国、西藏及印度的学说与实践》（1961）还跨区域地讨论了藏传佛教的转世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更多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参与到藏学中来。法国藏学主要以传统文献学为研究方法的面貌开始发生较大改观。例如，对喇嘛和僧人的传记书写和考察受到更多的重视，主要有人类学学者亚历山大·麦克唐纳（Alexandre W. Macdonald）所著《喇嘛与将军》（1973）、《二十世纪的宁玛巴喇嘛传》（1981）、《论达赖喇嘛》（1984）；今枝由郎所译洛本·白马的《大师活佛生平中的某些阶段》（1982）；海德·斯多达尔（Heather Stoddard）所著《安多的游方僧：根登群培（1905-1951 年）传》（1986），及译注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1992）；噶尔美的《五世达赖喇嘛的秘密愿景》（1988）等。

谷岚则主要通过考察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来研究汉藏关系。其专著《九世班禅喇嘛（1883-1937）》通过考察班禅喇嘛九世讨论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汉藏关系。<sup>①</sup>此外，谷岚还发表了《朝圣者之路：九世班禅喇嘛的旅程》（1996）、《中国对西藏的宗教政策》（2001）、《六世班禅喇嘛的汉文封号》（2002）、《班禅喇嘛与达赖喇嘛：出现问题的师徒关系》（2005）、《1908 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进京》（2009）等论文。谷氏也关注藏传佛教与西藏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及藏传佛教在台湾的传播与实践，如《佛教寺院与民间社会：基于西藏地权的分析》（2006），《台湾的藏传佛教》（2011）等。

宗教建筑方面：安娜·萨耶（Anne Chayet）的《热河寺庙及其西藏原型》为我们提供了传统宗教建筑被国家权力作为其政治宣传工具的典型案例，其中对藏文文献的解读在当时是比较有新意的。<sup>②</sup>她还发表了几篇考察成都文殊院、布达拉宫松赞干布堂、桑耶寺的小论文。费尔南·梅耶的论文《建筑的技术、社会、象征性和宗教功能》（与 C. Jest 合撰），收于其与另外两位学者主编的《人宅、神庙：西藏建筑艺术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1987）。卡蒂亚·毕夫特里耶则有论文《桑耶寺的修复：西藏庙主-施主关系持续性的例子？》（1989）和《基于西藏桑耶寺的修复提出的问题》（1992）。

宗教艺术方面：1977 年的《西藏艺术论文集》收录了石泰安的《摩伽罗嘴：某些法器难以解释的特点》和布隆多的《五世达赖喇嘛的雕像》。安娜·萨耶的《西藏的艺术

<sup>①</sup> Fabienne Jagou, *Le 9<sup>e</sup> Panchen Lama (1883-1937): Enjeu des relations sino-tibétaines*, Paris: EFEO, 2004; *The 9th Panchen Lama (1883-1937): A life at the crossroads of Sino-Tibetan relations*, Silkworm/EFEO, 2011.

<sup>②</sup> Anne Chayet, *Les temples de Jehol et leurs modèles tibétains*, Paris: Éditions Recherches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5.

与考古》则揭示了从9、10世纪开始，原本多元的西藏艺术只剩下佛教艺术或是指向宗教功能的艺术。<sup>①</sup>吉莱斯·贝甘（Gilles Béquin）编著有《喜马拉雅的神与魔：喇嘛教艺术展览目录》（合编，巴黎大皇宫，1977）、《达赖喇嘛尊者收藏的四十一幅唐卡》（1980）、《西藏——畏怖和巫术：吉美博物馆所藏畏怖神像》（1989）、《尼泊尔和西藏的着色工笔画和画卷》（1990）、《西藏的艺术、参禅、山僧和奥义》（1991）、《曼荼罗：吉美博物馆藏尼泊尔和西藏的深奥绘图》（1993）等专书，还发表了《一幅吉美博物馆藏西藏西部唐卡》（1990）等论文。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则发表了《〈格萨王传〉中的五幅唐卡》（1979）。

宗教音乐方面有音乐人类学学者米海尔·艾尔菲（Mireille Helffer）。藏传佛教传说中的乐符问题是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她撰有《献祭音乐：藏族乐器》等专著，<sup>②</sup>还发表了《与密教实践有关的乐器：基于贡珠扎巴（Kun Grol Grags Pa）的一个文本》（1983）、《关于藏族框式鼓（*ringa*）及其使用的观察研究》（1983）、《论西藏的金刚铃类型》（1985）、《藏传佛教音乐仪轨的西文著作综述（1960-1990）》（1990）等论文。

转山朝圣方面：布隆多曾在1960年发表过长篇论文《西藏的朝圣》，马修·卡普斯坦为《实践中的西藏宗教》（*Tibetan Religions in Practice*, 1997）撰有《水晶山指南：一种朝圣手册》等相关文章，近来则主要有卡蒂亚·毕夫特里耶主攻藏族人的朝圣活动研究。其专著《朝圣、喇嘛与见到异象者：论藏族朝圣的口头传说与文字记载》主要以人类学的方法考察了西藏和尼泊尔藏族人的朝圣活动，探讨了他们对圣地的理解与实践。<sup>③</sup>此外，她还撰有《一次阿尼玛卿山大朝圣：书写的传统，鲜活的现实》（1997）、《青海湖及其岛屿：传说与朝圣指南》（1999）、《食山——藏区随处可见的崇拜》（2002）、《朝圣与乱伦：以中锡边境的Chorten Nyima山为例》（2004）、《西藏朝圣的演变：二十一世纪的阿尼玛卿山朝圣》（2004）等一系列论文。

此外，安娜·萨耶的《达赖喇嘛时代的女性》最后一章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西藏女性的宗教信仰，如朝圣、女性喇嘛的寺院生活，女性在灵媒式附体、神占及密宗观念中的

---

<sup>①</sup> Anne Chayet, *Art et archéologie du Tibet*, Paris: Picard, 1994.

<sup>②</sup> Mireille Helffer, *Mchod-rol: Les instruments de la musique tibétaine*, Paris: CNRS Éditions/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de Paris, 1995.

<sup>③</sup> Katia Buffetrille, *Pèlerins, lamas et visionnaires. Sources orales et écrites sur les pèlerinages tibétains*, coll.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2000.

角色。<sup>①</sup>罗贝尔·萨耶（Robert Sallay）的《印藏佛教密宗》（1980）则是一本概论性质的专著。顺便提及，即将出版专著《权力与暴力的佛教仪式：藏族密宗大师形象》（基于尼泊尔北部的田野）的人类学学者尼古拉·西雷最近也开始到青海做田野，考察当地藏族人的宗教。

## 道教相关研究

法国的道教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开始的传教士、汉学家对道经的译介，而其学统的真正建立则要到19世纪末，奠基者为汉学大师沙畹。沙畹的三个学生伯希和、马伯乐和葛兰言都对道教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三代的学者有康德谟、石泰安、戴密微、苏远鸣；第四代则有索安、施舟人、贺碧来和司马虚。以上学者在道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见于索安所著《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sup>②</sup>在索安工作的基础上，吕鹏志又于2002年编译了专门的《法国道教研究编年史（1831-2002）》。<sup>③</sup>这里主要梳理2002年以来的研究成果。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2004年施舟人与傅飞岚主编《道藏通考》的完成。<sup>④</sup>这反映了从1976年施舟人提出《道藏》计划以来近30年欧美研究《道藏》的整体水平。作为《正统道藏》（1445）和《万历续道藏》（1607）的使用和研究指南，它与任继愈、钟肇鹏主编的《道藏提要》相辅相成。<sup>⑤</sup>与《道藏提要》相比，《道藏通考》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它没有按照《道藏》原有的编目顺序，而是以时代为框架，将每个文本置于道教不同传统的发展脉络之中。同源的文本常被置于同一条目之下进行考察。合集类的文本则常被分成不同的部分进行讨论，更清楚地揭示了它们各自的源流和发展。它也可以作为一些敦煌抄本的研究指南。其最大的意义是，它让《道藏》真正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确实可用的文献。与此同时，此工程促进了很多中国宗教研究领域中青年学者的成长，法国方面如

---

<sup>①</sup> Anne Chayet, *La Femme au temps des Dalai-lamas*, Paris: Stock-L. Pernoud, 1993.

<sup>②</sup> 索安：《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吕鹏志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sup>③</sup> 吕鹏志编译：〈法国道教研究文献目录（1831-2002）〉，收入《法国汉学》，第7辑，宗教史专号，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448-519。

<sup>④</sup>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3 vol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sup>⑤</sup> 任继愈、钟肇鹏主编：《道藏提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劳格文、傅飞岚、马克、戴思博、穆瑞明、高万桑等等。

除《道藏通考》的成果外，对道书的专门考察还有劳格文对《太上灵宝五符序》、《太上老君中经》的讨论，及其对《道藏》形成过程的重新梳理；<sup>①</sup>郭艾思的《中华帝国早期口头表达与文字书写之间的神启：〈太平经〉认识论研究》、《顺水漂流：〈太平经〉思想体系中三元逻辑的逆反或双重性》、《中古道教史中的斯坦因第 4226 号写本〈太平部卷第二〉》、《编译〈太平经〉与太平部经典》，及其对《太平经圣君秘旨》的全面考察；<sup>②</sup>穆瑞明所撰《敦煌本〈无上秘要〉的整理及编目》一文；<sup>③</sup>吕鹏志与史格伟(Patrick Sigwalt)所撰评论性文章《道教史上的古灵宝经》等。<sup>④</sup>

总体研究方面有劳格文的《中国：神州》。该书先长时段地考察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基本结构，然后依次探讨了神灵谱系、社会与历史中的道教仪式、中国东南的节庆和地方宗教的合理性。从宗教的视角去理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是作者自 1980 年代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sup>⑤</sup>这与很多主要从宗族和血缘来理解中国社会的华南社会文化史学者形成鲜明对比。<sup>⑥</sup>实际上，早在 2007 年，作者就已经从自身研究经验出发，对主要从宗族来理解中国社会的视角作了精当的评述。<sup>⑦</sup>作者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以宗教来定义的中国，它区别于以宗族来定义的中国：中国是复数的。而在其中，宗教的中国——“神州”无疑扮演了主要角色。此外，劳格文的《中国的神权与朝代危机：政治合法性的宗教基础》、

---

<sup>①</sup> John Lagerwey, “Deux écrits taoïstes anciens,” in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 14, 2004, pp. 139-171; “Littérature taoïste et formation du Canon,” in *Religion et société en Chin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pp. 459-492.

<sup>②</sup> Grégoire Espeset, “Revelation between orality and writing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Taiping jing*,” i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Östasiatiska Museet), vol. 74 (2002), paru en 2004, pp. 66-100; “À vau-l'eau, à rebours ou l'ambivalence de la logique triadique dans l'idéologie du *Taiping jing*,” in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 14, pp. 61-95; “Le manuscrit Stein 4226 *Taiping bu juan di er*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médiéval,” in *Études de Dunhuang et Turfan*, pp. 189-256; “Editing and translating the *Taiping Jing* and the Great peace textual corpus,” i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48, 2008, pp. 469-486; “Les Directives secrètes du Saint Seigneur du Livre de la Grande paix et la préservation de l'unité,” in *T'oung Pao*, vol. 95, 2009, pp. 1-50.

<sup>③</sup> Christine Mollier, “Mise en texte et table des matières du *Wushang biao*, la grande encyclopédie taoïste du VI<sup>ème</sup> siècle conservée à Dunhuang,” in Jean-Pierre Drège (ed.), *La fabrique du lisible en Chine*, Genève: Droz, sous presse.

<sup>④</sup> Lü Pengzhi and Patrick Sigwalt, “Les textes du Lingbao ancien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 in *T'oung Pao*, vol. 91, 2005, pp. 192-194.

<sup>⑤</sup> 参见 John Lagerwey, *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New York &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sup>⑥</sup> 这方面的例子如 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已有卜永坚中译本：《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sup>⑦</sup> John Lagerwey, “State and loca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T'oung Pao*, vol. 93, 2007, pp. 459-479.

《分裂时期的宗教与政治》这两篇文章，可以说也体现了其对“神州”的思考。<sup>①</sup>

神明崇拜研究方面。贝桂菊在近 20 年间田野再考察的基础之上，重写了其法文版《临水夫人：一个中国女性的崇拜》，并在 2008 年出了英文版。<sup>②</sup>该书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女性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作者主要使用了至迟在 17 世纪晚期就已出现的通俗小说《临水平妖传》。这本小说详细记载了临水夫人陈靖姑的生平及其成神的传说。小说揭示了一个在生时拒绝扮演传统儒家指定角色的女性并因此付出代价，后来却成为儒教伦理崇奉者的女神。我们也看到一群隐于山洞以滋养元气，如仙人般生活，却不扮演社会期待角色的女性，以及一群试图利用他人以达到永生的女妖。此外，小说也从女性的角度对男性英雄进行了呈现。作者对这些内容进行了结构象征主义的分析。最后四章则结合了作者在台南和闽东的人类学调查，在考察与临水夫人信仰相关仪式的同时也给《临水平妖传》提供了社会和仪式语境，加深了我们对前述女性群体的理解。作者进一步探讨了临水夫人作为儿童保护神的角色与乩童（灵媒）的关系。该书体现了贝桂菊对宗教中的性别，尤其是女性表征（représentation）的特别关注。实际上，这也正是其兴趣和专长所在。例如，她另一篇重要的文章《化己为神：表述场的寻求》就是主要通过考察当代福建南部乡村的两个女性灵媒来展开讨论的。<sup>③</sup>此外，贝桂菊还对华山夜间进香进行了考察。<sup>④</sup>

除了贝桂菊，探讨神明崇拜的学者还有劳格文、方玲、华澜等。劳格文的一篇文章考察了闽西崇拜伏虎禅师的十乡轮祀，另一篇则从区域比较研究的角度考察了闽西、闽南、徽州的神明与祖先崇拜。<sup>⑤</sup>方玲考察了药王以及西汉浙江方士赵炳的崇拜。<sup>①</sup>华澜和

---

<sup>①</sup> John Lagerwey, “Droit divin et crise dynastique en Chine: les fondements religieux de la légitimité politique,” in John Lagerwey (ed.), *Religion et politique en Asie: Histoire et actualité*,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06, pp. 49-56; “Religion et politique pendant la période de Division,” in *Religion et société en Chin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pp. 397-428.

<sup>②</sup> Brigitte Baptandier, *La Dame-du Bord-de-l'Eau*, Nanterre: Société d'Ethnologie, 1988; *The Lady of Linsui: A Chinese female cult*, Trans. Kristin Ingrid Fryklu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更详细的评介参见刘永华的英文书评，刊于 *The China Journal*, no. 62, 2009, pp. 244-246.

<sup>③</sup> Brigitte Baptandier, “Façonner la divinité en soi. À la recherche d'un lieu d'énonciation,” in A. Marshall (ed.), *Negotiating Transcendence/Négocier la transcendance: expressions de la performance extatique dans la religion et le théâtre* (*Ethnologies*, vol. 25, no. 1), 2003, pp. 109-152.

<sup>④</sup> Brigitte Baptandier, *Le regard inversé. Voyage nocturne au Mont de la Splendeur* 反向的观察：夜游华山, Nanterre: Société d'Ethnologie, à paraître.

<sup>⑤</sup> John Lagerwey, “Of gods and ancestors: the Ten-village rotation of Pingyuan shan,” 收入《民俗曲艺》第 137 期，2002，页 61-139; “Gods and ancestors: Cases of crossover,” 收入谭伟伦主编：《中国地方宗教仪式论集》(*Essays on Chinese local religious rituals*)，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对湖南民间供奉的雕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华南的宗教雕像与祝圣文书（十七至二十世纪）》、《论湘中家祀雕像：神明、亲人与法师崇拜》等。

②范华（Patrice Fava）的《入天门——湖南的道教雕刻艺术：中国的艺术与人类学研究》也对湖南的神像进行了专门考察，并将它们定义为道教神像。<sup>③</sup>

社会史领域有高万桑《北京道士（1800-1949）：城市教士的社会史》。<sup>④</sup>此书考察了北京道士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各种角色。作者恰当地运用了政府档案、寺庙碑刻、道教文本、传教士回忆录、民国政府性质调查、田野观察视角的调查等原始材料，依次考察了制度、社会及政治语境中的北京道士。通过讨论在帝国晚期和民国时期历史书写中长期被忽视的群体，这部宗教职业社会史加深了我们对 19、20 世纪北京的理解。高氏的其它几篇文章也从宗教的角度讨论了北京社会，如《刘沅：蒙古治下北京的道士与雕塑家》（2005）、《抑制不住的女性虔诚：针对女性进庙的帝国禁令》（2008）、《中国近代修炼市场中的道士：以北京为例，1850-1949》（2012）等。近年来，高万桑将考察的重点转移到了江南地区，已经发表了不少成果，如《清代江南地区的城隍庙、张天师及道教官僚体系》（2010）、《官僚、征税与司法：道教与国家在江南的建构，十七至十九世纪》（2010）、《金盖山网络：近现代江南的全真居士组织》（2011）等。

佛道关系研究方面有穆瑞明的《佛道面对面：中古中国的经书、仪式与图像交流》。<sup>⑤</sup>此书从佛道互动的视角考察了中古佛教、道教之间的互动。其中讨论的佛经与道经都

---

2011，页 371-410。

① Fang Ling, “Inscription du temple du roi des Remèdes (Pékin, Yaowang miao, 1806) 1806 年北京药王庙碑刻,” in *Sanjiao wenxian : Matériaux pour l'étude de la religion chinoise*, 4 (2005), Édition EPHE/CNWS, pp. 82-90; (赵炳崇拜的历史), 载《台湾宗教研究》, 第 6 卷第 2 期, 2007, 页 1-23。

② Alain Arrault, Michela Bussotti, “Statuettes religieuses et certificats de consécration en Chine du Sud (XVIIe-XXe siècle),” in *Arts Asiatiques*, vol. 63, 2008, pp. 36-60; 〈湘中神像研究〉, 收入陈子艾、华澜主编:《“湘中宗教与乡土社会”调查报告集》,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即出。Alain Arrault, “Analytic essay on the domestic statuary of central Hunan. The cult to divinities, parents and masters,” i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vol. 36, 2008, pp. 1-53; “La société locale vue à travers la statuaire domestique du Hunan 从湖南家祀雕像看乡土社会,” in Alain Arrault (ed.), *Religions et société locale. Études interdisciplinaires sur la région centrale du Hunan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 19)*, 2010, pp. 47-132. Michela Bussotti, “Observations sur les sculpteurs de statuettes religieuses du Hunan 湖南宗教雕像的雕刻匠人观察研究,” in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 19, pp. 135-181.

③ Patrice Fava, *Aux portes du ciel. La statuaire taoïste du Hunan: Art et 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3.

④ Vincent Goossaert, *The Taoists of Peking, 1800-1949: 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⑤ Christine Mollier, *Buddhism and Taoism face to face: scripture, ritual, and iconographic exchange in medieval China*,

与仪式实践紧密相关。这些仪式都以为其实践者求福为目的，涉及中古中国社会关注的长生与成仙、现世与来世救赎、疾病尤其是鬼病治疗等基本问题，突出地表现在驱邪、冥想与修炼这三方面。具体来说，该书依次考察了天厨、解诅咒、益算这三类经书，以及北斗、观音/救苦天尊信仰。最后，作者认为应该从社会文化环境中去寻求佛道互动的动因。还指出佛道之外的第三类仪式专家，即从事占星、占卜、巫医等半宗教性职业的仪式专家。他们虽然活跃于佛道组织的边缘，但他们与佛道一起，构成区域社会生活中三维的宗教动力。可以说，该书在具体和实践的层面对佛道互动的考察为中古中国佛道关系研究增加了一个重要维度。作者另有三篇探讨佛道关系的文章为《从人物造像看佛道关系：唐玄宗时期的四川悬崖雕刻》、《指向不可协调元素的协调：中古道教中的因果报应与亲缘关系纽带》和《中古中国的佛道对话：沉默是金》。<sup>①</sup>

官观研究方面，谢道琳在2005年出版了其博士论文《自足的生活：今日中国道士》。<sup>②</sup>这首先是一部人类学的研究，其田野考察以陕南的一座道观为中心。它考察了道士放弃常人生活而进入宗教秩序的入道过程：脱离俗世社会以宗族为基础的组织，转而进入旨在超越性别区别的伪宗族关系网络。具体来说，第一部分考察了宫观建筑、作为社区的宫观、信众的进香和供奉的神明，这种民族志式的背景展现占了该书一半的篇幅；第二、三部分，作者从人类学的宗族理论出发，通过考察宫观道士团体讨论入道究竟意味着什么，即作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作者从经典的人类学视角去考察全真道观社区，它就像一个有着自己领地、成员、仪式、文化和内部组织的“部落”，明显而有意识地区别于它所在的社会。这一借助人类学理论对“宗族”模式宫观组织的探讨，对中国寺观研究有着特殊的启迪意义。谢氏的其它研究也基本是围绕着宫观及道士生活展开的，如《中国宫观道士的社区：建立在文本基础上的仪式性亲属关系》（2007）、《存在一种没有亲属关系的生活吗》（2009）、《一个住观道士生活的一天》（2009）等。

官观研究方面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高万桑。他撰有《宗教遗产的破坏与修复：北京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sup>①</sup> Christine Mollier, "Iconizing the Daoist-Buddhist relationship: Cliff sculptures in Sichua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Tang Xuanzong," 收入《道教研究学报：宗教、历史与社会》，第二期，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2010，页95-133；"To reconcile the irreconcilable: Karma and the bonds of kinship in medieval Taoism," in Meir Shahar and John Kieschnick (eds.), *China under an Indian spell: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cul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to be published); "Buddhist and Taoist dialogue in medieval China: Silence is golden," in *Deconstructing dialogu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o be published).

<sup>②</sup> Adeline Herrou, *La vie entre soi. Les moines taoïstes aujourd'hui en Chine*, Nanterre: Société d'Ethnologie, 2005.

寺庙》(2003)、《远东毁灭文物的一种国家行为?——中日历史上对宗教场所的破坏》(2006)、《中华帝国晚期的火居法士与寺庙管理者》(2006)、《空间与圣庙:寺庙》(2008)、《清代中国的毁淫祀》(2009)、《1980年以来中国城市的庙宇与道士》(与方玲合撰,2009)、《中国近代的中心庙宇与道教文化的传播》(2010)、《肆虐的压制?中国清代的毁淫祀》(2011)、《庙产办学:一个史学对象的构建》(2011)等论文。此外,马颂仁撰有《全真宫观与方济各会修道院秩序的建立》(2009)。

科仪研究方面。劳格文对公元2至6世纪的道教仪式、陆修静的道教仪式、《老君音诵诫经》呈现的仪式、道教驱邪的起源进行了探讨,其近年对客家地区和徽州地区的宗教调查也包括了道教的考察。<sup>①</sup>傅飞岚考察了二十四治与早期天师道空间和科仪结构的关系、天师道的上章科仪、天师道的科仪程式文本《赤松子章历》、早期道教仪式中的治疗与救赎、《法烛经》所见陆修静对佛教斋仪的回应等。<sup>②</sup>他还通过考察《道教灵验记》讨论了晚唐佛教的护法传统。<sup>③</sup>此外,史格伟通过分析5世纪的《五鍊生尸经》考察了灵宝派的丧葬仪式。<sup>④</sup>贝桂菊则从道教、密教比较的角度考察了闾山派手印。<sup>⑤</sup>范华对湖南的道教科仪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结合其专长,拍摄和制作了精彩的影片。<sup>⑥</sup>

<sup>①</sup> John Lagerwey, "Le rituel taoïste du deuxième au sixième siècle," in *Religion et société en Chin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pp. 565-600; "Le rituel taoïste selon Lu Xiujing," à paraître; "The Old Lord's Scripture for the Chanting of the Commandments," in Florian C. Reiter (ed.), *Purposes, means and convictions in Daoism: A Berlin symposiu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7, pp. 29-56; "The origins of Daoist exorcism," in Florian C. Reiter (ed.), *Exorcism in Daoism: A Berlin symposiu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1, pp. 1-10. 对客家地区和徽州地区宗教的考察如: "Village religion in Huizhou: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收入《民俗曲艺》第174期, 2011, 页305-357。

<sup>②</sup> 傅飞岚 (Franciscus Verellen): 〈二十四治和道教天师道的空间与科仪结构〉, 收入《法国汉学》, 第7辑, 页212-253; 〈天师道上章科仪:《赤松子章历》和《元辰章醮立成历》研究〉, 收入黎志添主编:《道教经典与中国宗教文化》, 香港: 中华书局, 2003, 页37-71; "The Heavenly Master liturgical agenda: The *Petition Almanac of Chisong zi*," in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 14, pp. 291-343; "Guérison et rédemption dans le rituel taoïste ancien 古代道教仪式中的治疗与救赎," in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nnée 2003, 2005*, pp. 1029-1047; "The Illumination of Ritual: Lu Xiujing's Reflections on the Retreat 法烛: 陆修静对斋的改造与呈现," 收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75周年纪念编:《中国宗教文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东京: 京都大学, 2004, 页239-257。

<sup>③</sup> 傅飞岚:《〈道教灵验记〉——中国晚唐佛教护法传统的转换》, 载《华学》, 第5辑, 2002, 页38-64。

<sup>④</sup> Patrick Sigwalt, "Le rite funéraire Lingbao à travers le *Wulian shengshi jing* (Ve siècle)," in *T'oung Pao*, vol. 92, 2006, pp. 325-372.

<sup>⑤</sup> 贝桂菊:〈闾山派手印: 生命之颤动〉, 收入叶明生主编:《中国首届临水夫人陈靖姑文化学术研讨会》, 福建古田, 2010, 页21-34。

<sup>⑥</sup> 范华:〈湖南道教调查研究——陈德美道长的法事科仪〉(会议演讲)、《韩信复仇记: 还都猖愿》(影片放映), 道教学术研讨会, 香港: 香港大学, 2011年4月21-23日; *Aux portes du ciel. La statuaire taoïste du Hunan: Art et 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

符篆、符咒研究方面。除了《佛道面对面》中的相关讨论，穆瑞明还撰有《符》、《益算符》、《经与符：神话与实践》、《斯坦因 170 号画-符（dhāraṇī）：一种革新文书》等论文。<sup>①</sup>傅飞岚的《动力之图：道经中的仪式与存想图案》也是对符的专门探讨。<sup>②</sup>劳格文则考察了正一派的篆。<sup>③</sup>

养生与求仙研究方面有戴思博的《中国古代的导引》、《宋明时期中国医学和道教文献中身体的可视化呈现（十至十九世纪）》、《中国古代战国到汉代的自我修行与永生实践》；<sup>④</sup>劳格文的《求仙者：中国古代的神明、祖先与仙人》；<sup>⑤</sup>马颂仁的《中国内丹：气的象征与修炼》。<sup>⑥</sup>郭艾思的一篇文章则讨论了《太平经》等文献中关于生殖及生命周期的观念，并将之归结为“反为婴儿”。<sup>⑦</sup>

考察道教史的其它文章中，有三篇探讨了早期道教中恶的观念及相关实践：郭艾思的《〈太平经〉第二层次中被判定的异常、道德病理学与赎身苦楚》、穆瑞明的《恶的意象：早期道教中的鬼神理论与正统》以及劳格文的《早期道教中的恶及其疗法》。<sup>⑧</sup>其它

---

<sup>①</sup> Christine Mollier, “Talismans,” in *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Études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 pp. 403-429; “Les talismans pour accroître le capital-vie,” in *Études de Dunhuang et Turfan*, pp. 155-188; “Écrits saints et talismans: mythe et pratique,” in *La voie du Tao, Un autre chemin de l'être*, pp. 103-109; “Le talisman-dhāraṇī Stein painting 170: un document reformaté,” in *La fabrique du lisible en Chine*, sous presse.

<sup>②</sup> Franciscus Verllen, “The dynamic design: Ritual and contemplative graphics in Taoist scriptures,” in Benjamin Penny (ed.), *Daoism in history: Essays in honour of Liu Ts'un-Yan*, Londres: Routledge-Curzon, 2006, pp. 159-186.

<sup>③</sup> John Lagerwey, “Zhengyi registers,” i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visiting professor lecture series (I),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Special Issu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pp. 35-88.

<sup>④</sup> Cathrine Despeux, “La gymnastique (*daoyin*) dans la Chine antique,” in *Études chinoises*, vol. 23, 2004, pp. 45-81;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body in chinese medical and Daoist texts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period (t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y),” in *Asian Medicine*, Brill, 2005, pp. 9-52; “Culture de soi et pratiques d’immortalité dans la Chine antique des Royaumes Combattants aux Han,” in *Relig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pp. 241-275.

<sup>⑤</sup> John Lagerwey, “Les chercheurs d’immortalité: Dieux, ancêtres et immortels dans la Chine antique,” in Frédéric Lenoir and Jean-Philippe de Tonnac (eds.), *La mort et l’immortalité: encyclopédie des savoirs et des croyances*, Paris: Bayard Jeunesse, 2004, pp. 137-161.

<sup>⑥</sup> Pierre Marsone, “L’alchimie intérieure chinoise: symbolique et spiritualité d’un travail sur les énergies du corps,” in Claire Kappler and Suzanne Thiollier-Méjean (eds.), *Alchimies Occident-Orient*, Paris: L’Harmattan, 2006, pp. 315-329.

<sup>⑦</sup> Grégoire Espeset, “Prenatal infancy regained: Great peace (*Taiping*) views on procreation and life cycles,” in Anna Andreeva and Dominic Steavu (eds.), *Embryological discourse and reproductive imagery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religions*, à paraître (2013).

<sup>⑧</sup> Grégoire Espeset, “Criminalized abnormality, moral etiology, and redemptive suffering in the secondary strata of the *Taiping jing*,” in *Asia Major* (3ème série) 15/2, 2002, (paru en 2005), pp. 1-50 ; Christine Mollier, “Visions of evil: Demonology and orthodoxy in early Taoism,” in *Daoism in history, Essays in honour of Liu T'un-yan*, pp. 74-100 ; John Lagerwey, “Evil and its treatment in early Taoism,” in Jerald D. Gort, Henry Jansen

则还有劳格文《早期道教的救世主义》(2002);高万桑的《神权君授:晚清中国的天师道制度及宫廷道士》(2004)、《全真教:1700-1950》(2004)、《全真道的环堵考》(2004);郭艾思的《西汉的宗教性大众运动与早期道教教团》(2009)等。

此外,施舟人出版了论文集《中国宗教:活着的传统》,导言即题为“活着的传统”,共收入其1979至2006年间的15篇论文。<sup>①</sup>概论类的专著有高万桑与贾珞琳的《道教:持续的神启》,这是一部旨在向西方读者全面介绍道教的书。<sup>②</sup>文献译介方面则有戴思博的《老子》(2010);高万桑的《吕洞宾与道教神性》(2002)和《善书八种》(2012)等。

值得一提的还有2010年在巴黎举办的道教文化展览“道:生之蹊径”。<sup>③</sup>该展览分为宇宙起源、老子、西王母、众神、长生、科仪等六个部分,共展出绘画、雕塑、青铜器、织品、道书等各种文物250余件,其中多为珍品。更为重要的是,展览得到诸多学者的积极参与,如施舟人、戴思博、马蒂厄、穆瑞明、华澜等。这使得此次展览不仅成为欧洲的首次大型道教文化展,其水平和层次也是空前的。

## 当代儒教研究

20世纪中期以来,法国学界对儒学的研究有了较大突破,首先是儒学思想史方面,出现了谢和耐、汪德迈、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程艾蓝等重要学者,其次则为当代儒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sup>④</sup>

当代儒教研究方面,其先驱当为耶稣会士路易(Louis Wang Jen-Chen)神父。1941年,他在上海的《震旦杂志》上发表了报告《祖先的木主》。<sup>⑤</sup>这篇文章引起了荣振华(Joseph

---

and Hendrik M. Vroom (eds.), *Probing the depths of evil and good: Multireligious views and case studies*, Amsterdam/New York, 2007, pp. 73-86.

<sup>①</sup> Kristofer Schipper, *La religion de la Chine. La tradition vivante*, Paris: Fayard, 2008.

<sup>②</sup> Vincent Goossaert and Caroline Gyss, *Le Taoïsme. La révélation continue*, Paris: Gallimard (coll. Découvertes), 2010.

<sup>③</sup> Jacques Giès, Kristofer Schipper, etc., *La voie du Tao: Un autre chemin de l'être* (Catalogue de l'exposition Taoïsme au Grand Palais, Paris, 2010),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2010.

<sup>④</sup> 关于法国学界在儒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参见岑咏芳:〈法国新儒家领域之研究〉,载《新亚学报》,第28期,2010,页47-66;〈儒学近年在法国的发展——自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与程艾蓝(Anne Cheng)两篇就职讲词分析说起〉,载《中央大学人文学报》,第52期,2012,页193-209。这两篇文章均惠蒙岑咏芳女士赐读。

<sup>⑤</sup> Louis Wang Jen-Chen, “Les tablettes des ancêtres,” in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de l'Aurore*, tome 2, no. 2, 1941, pp.

Dehergne 1903-1990) 的注意。1978 年, 荣氏在路易报告的基础上, 撰文《儒教中国祖先崇拜中的木主》, 发表在巴黎的《宗教学研究》上。<sup>①</sup>这篇文章在阐述路易基本观点的同时, 也加入了荣氏自己的思考, 主要探讨了 1934 年以前“儒教中国”的婚礼与祖先崇拜之间的联系。这本是很有意思的论题, 只可惜在荣氏之后, 法国方面似乎就未有人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专门探讨了。

不过, 近年来还是有学者注意到儒教研究的重要性, 并对儒教的其它方面进行考察。首先是施舟人在 1994 年指出, 相对于学界对民间宗教与道教之间紧密联系的探讨, “民间宗教与儒教 (Confucianism) 之间同样——甚或更为重要的关系, 还没有得到什么讨论”。<sup>②</sup>2000 年, 华澜发表了《中国的家庭: 儒教家庭? ——中国家庭中的祖先崇拜、亲属制度、仪式与教育刍议》一文。<sup>③</sup>2005 年, 高万桑在“与西方宗教观念相比儒教如何才能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儒教 (religion confucianiste) 的转变 (1898-1937)》考察了在 20 世纪初“宗教”与“儒家/儒教”范畴被再造的背景之下, 儒家宗教实践的变化。杜瑞乐在同一会议上的论文则探讨了当代新儒学思想中的宗教命运。<sup>④</sup>目前, 这一领域主要的法国学者则为毕游塞与杜瑞乐。近五年来, 他们从思想文化史与人类学的角度, 考察了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不同形态和意义, 并就此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 《新世纪开端中国的儒学、文化传统与官方话语》和《教化: 作为教育设计的中国儒学复兴》关注的是儒学复兴及其实践;<sup>⑤</sup>《安身立命或儒学之宗教维度》对儒学的宗

---

243-280.

<sup>①</sup> Joseph Dehergne, “Les tablettes dans le culte des ancêtres en Chine confucéenne,” in *Recherches de Science Religieuse*, vol. 66, no. 2, 1978, pp. 201-214.

<sup>②</sup> Kristofer M. Schipper, “Sources of modern popular worship in the Taoist Canon: A critical appraisal,” i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r beliefs and chinese culture*, Taipe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4, vol. 1, p. 21. 转引自刘永华:《亦礼亦俗——晚清至民国闽西四保礼生的初步分析》, 收入《历史人类学学刊》, 第 2 卷第 2 期, 2004, 页 54。

<sup>③</sup> Alain Arrault, “Famille chinoise: famille confucéenne ? Quelques remarques au sujet du culte des ancêtres, du système de parenté, des rites et de l’éducation dans la famille chinoise,” in C. Capron and M. Neven (ed.), *Family structures, demography and population: A comparison of societies in Asia and Europe*, Liège: Laboratoire de démographie de l’Université de Liège - Fondation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2000, pp. 51-71.

<sup>④</sup> Vincent Goossaert, “Les mutations de la religion confucianiste (1898-1937)” ; Joël Thoraval, “Le destin du religieux dans la pensée néo-confucéenne contemporaine,” in Flora Blanchon and Rang-Ri Park-Barjot (eds.), *Le nouvel âge de Confucius 孔子的新时代. Modern Confucianism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此书为 2005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与西方宗教观念相比儒教如何才能定位[Comment le confucianisme peut-il être situé par rapport à la conception occidentale de la religion ?]”的论文集), Paris: PUPS, 2007, pp. 163-172, 247-252.

<sup>⑤</sup> Sébastien Billioud, “Confucianism, ‘cultural tradition’ and official discourses at the start of the new century,” in *China Perspectives*, no. 2007(3), pp. 50-65 and *Perspectives chinoises*, no. 2007(3) (in French), pp.53-68; Sébastien Billioud and Joël Thoraval,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part 1). *Jiaohua: The Confucian*



教维度进行了专门探讨，分析了儒教作为特定宗教（*religion particulière*）、公民宗教（*religion civile*）与国家宗教（*religion d'État*）的可能性。<sup>①</sup>《礼教：中国大陆尊孔仪式的回归》则考察了山东曲阜每年九月底的尊孔仪式，探讨了官方与民间儒家复兴人士之间的反差与互动，以及后毛泽东时代儒家的复杂用途及过度运用。<sup>②</sup>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博士生杜杰庸（Guillaume Dutournier）则通过《社会实验与民间儒学：以庐江文化教育中心为个案》（与汲喆合著）和《当代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家庭教育组织——考察传统主义的三个视角》两篇文章，从非官方教育的角度考察了民间儒学运动。<sup>③</sup>此外，汲喆在法国最早注意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儒学思潮，并就此发表了多篇述评。<sup>④</sup>

## 新兴宗教研究

这方面的学者主要有宗树人和毕游塞。2005年，宗树人出版了其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博士论文《中国气功热：治疗、宗教与政治》，并于2007年以《中国气功热：身体、科学与乌托邦主义》为题出了英文版。该书考察了1949至1999年间作为社会运动的气功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揭示了传统中作为自我修炼和救赎运动的气功在现代性中的转变，认为气功在后毛泽东时代成为中国城市居民表达宗教性的主要途径。具体而言，作者融合了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视角，探讨了气功热是如何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变迁的语境中传播的。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对气功师、政府官员、科学家、气功练习者以及意识形态官员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示了气功热是如何升温、分化，

---

revival today as an educative project,” in *China Perspectives*, no. 2007(4), pp. 4-20 (in English) and *Perspectives chinoises*, no. 2007(4), pp. 4-21 (in French).

<sup>①</sup> Sébastien Billioud and Joël Thoraval,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part 2). *Anshen liming* or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 Perspectives*, no. 2008 (3), pp. 88-106 and *Perspectives chinoises*, no. 2008 (3), pp. 96-116.

<sup>②</sup> Sébastien Billioud and Joël Thoraval,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part 3). *Lijiao*: The return of ceremonies honouring Confucius in mainland China,” in *China Perspectives*, no. 2009 (4), pp. 82-99 and *Perspectives chinoises*, no. 2009 (4).

<sup>③</sup> Guillaume Dutournier and Ji Zhe, “Expérimentation sociale et confucianisme populaire. Le cas du ‘Centre d’éducation culturelle de Lujiang’,” in *Perspectives chinoises*, no. 2009 (4), pp. 71-86; Guillaume Dutournier, “Les ‘écoles familiales’ en Chine continentale et à Taiwan: triple regard sur un traditionalisme éducatif,” in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vol. 33, 2011, pp. 170-208.

<sup>④</sup> 例如：Ji Zhe, “Confucius, les libéraux et le Parti. Le renouveau du confucianisme politique,” in *La Vie des Idées*, mai 2005, pp. 9-20; Ji Zhe, “Tianxia, retour en force d’un concept oublié. Portrait des nouveaux penseurs confucianistes,” in *La Vie des Idées*, 2008, <http://laviedesidees.fr/Tianxia-retour-en-force-d-un.html>

最终随着对法轮功的禁令而瓦解的。<sup>①</sup>毕游塞则对在台湾发展成第三大宗教、且作为“新兴宗教”在整个亚洲迅速发展的一贯道进行了考察。其论文《一贯道的救世之道》通过在香港进行的人类学调查,分析了教育在一贯道的宗教扩张中所扮演的角色。文章指出,一贯道不仅有组织地向社会推广以儒家文本为主要内容的读经活动,而且格外注重对“道亲”的培训。与此同时,“教化”也是一贯道面对政治权力时使自身合法化的一种方式。<sup>②</sup>

## 少数民族宗教研究

早期在彝族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邓明德(Paul Vial 1855-1917)神父的《罗罗人的历史、宗教、风俗、语言和文字》(1898,其书评见同年《通报》第9卷)、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的《罗罗人:问题之现状》(1907《通报》第8卷),以及马德罗勒(Claudius Madrolle 1870-1949)的《一些罗罗部落》(1908《通报》第9卷)。纳西族方面主要有高第的《么些族》(1908《通报》第9卷)和巴科的《么些人种志:宗教、语言及文字》(1913)。前者提到了藏传佛教在么些族中的重要位置,以及么些族的其它仪式及仪式专家;后者是第一本考察纳西东巴文化的论著。马伯乐的《中国古代与近代泰族的社会与宗教》(1929)致力于探讨古代中国文明与中国南部/南边的傣/泰族、罗罗族、摩梭族、苗族等族群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依次考察了农民的生活、春季节庆、官方宗教、神话及高地东京(越南北部)黑泰的丧葬习俗。石泰安则在《汉藏走廊的羌族》(1958)一文中讨论了羌族的巫师。

1980年代以来,不少人类学学者开始对中国少数民族宗教进行考察。雅克·勒穆瓦纳(Jacques Lemoine)主要有论著《瑶族神像研究》(1982),还曾搜集整理瑶族道经《开坛经》,另有《瑶族挂灯度戒仪式中龟象征》(1992)等论文。作为宗教史学者,司马虚则通过解读日本人类学学者在瑶民中发现的宗教文献,指出道教在华南社会文化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认为华南土著“汉化”的过程,大致上是道教在本地区渗透的结果,这一过程可以上溯至宋代,其主要表现就是为教区内成员举行大规模受戒并获得法

---

<sup>①</sup> David A. Palmer, *La fièvre du Qigong: Guérison, religion et politique en Chine, 1949-1999*, Paris: Éditions EHESS, 2005; *Qigong fever: Body, science and utopia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sup>②</sup> Sébastien Billoud, “Le rôle de l’éducation dans le projet salvateur du Yiguandao,” in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vol. 33, pp. 211-232.

名的仪式。<sup>①</sup>施帝恩主要研究滇西北的独龙族，其田野考察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他的一篇文章讨论了1949年之前滇西北怒江、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怒族等邻近族群间通过宗教祭祀活动表达的一种共通的“仪式语言”（2007，已有中译本见《青海民族研究》2009[3]）。实际上，这篇文章表达了其论著《缺少的分享：云南独龙族的交换与权力》的一些基本观点。<sup>②</sup>他的另一篇文章则考察了独龙族对土地肥力的崇拜及相关仪式（2012）。1998年开始考察云南彝族的奥雷莉·内沃主要有《云南彝族文字中的萨满教》和《唱师的萨满唱词》。<sup>③</sup>此外，魏明德（Benot Vermander）对凉山彝族宗教进行了考察，撰有《凉山彝族的宗教蜕变：今日凉山彝族宗教信仰与体验调查探析》（1998）、《有关凉山地区彝族诺苏支系宗教的六项论题》（1998）、《凉山彝族人中的仪式与神圣》（2008）等论文。

#### 基督宗教研究<sup>④</sup>

法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国学界较早注意到的则为19世纪法国学界对景教的考察。入华遣使会会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 1813-1860）的《中国中原、鞑靼和西藏的基督教》（1857）；鲍吉耶（Guillaume Pauthier 1801-1873）的文章《论西安府景教碑的真实性和可靠性》（1857），及专著《西安府的叙利亚-汉文碑》（1858）；梯尔桑的（Philibert Dabry de Thiersant 1826-1898）的《八世纪中国的天主教》（1877）；来华耶稣会士夏鸣雷（Henri Havret 1848-1901）神父的《西安府基督碑》（三卷，1895、1897、1902）；伯希和的《蒙古人与教廷》、《景教所用之二佛称谓》（1911）、《唐元时期中亚及远东基督教徒》（1914《通报》第15卷）、《景教碑中叙利亚文之长安洛阳》（1927

---

<sup>①</sup> Michel Strickmann, “The Tao among the Yao: Taoism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south China,” 收入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纪念の会：《史にお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集》，东京：国书刊行会，1982, pp. 22-30.

<sup>②</sup> Stéphane Gros, *La part manquante: Échanges et pouvoirs chez les Drung du Yunnan (Chine)*, Nanterre: Société d’Ethnologie, 2012.

<sup>③</sup> Aurélie Névot, “Comme le sel, je suis le cours de l’eau,” *le chamanisme à écriture des Yi du Yunnan (Chine)*, Nanterre: Société d’Ethnologie, 2008; *Versets chamaniques d’un maître de la psalmodie*, Nanterre: Société d’Ethnologie, sous presse.

<sup>④</sup> 关于16至18世纪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耿昇已经做过系统、详尽的梳理，参见氏撰：《法国汉学界对于中西方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收入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耿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1-41。不过，鉴于耿昇介绍的研究限定于16至18世纪的入华耶稣会士，加上近年法国学界亦有新出的成果，笔者在此还是斗胆对法国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介绍。

《通报》第 25 卷 1-2 期)、《西安府景教碑》(遗著, 1996); 谢和耐的《西安府景教碑的中国语境刍议》(2008) 等均对西安景教碑进行了考察。<sup>①</sup>沙畹的论文《景教和哈喇和林遗址 (kara Balgassun) 碑铭》(1897) 所考碑铭也与景教在中国的发展直接相关。

该领域比重最大的是入华耶稣会士研究, 在 20 世纪中期之前主要为资料整理和初步研究。其主力多为耶稣会士, 代表人物有裴化行 (Henri Bernard-Maitre 1889-1975) 和荣振华。裴化行以其多产和著述中资料的丰富性而闻名, 如《利玛窦对中国的科学贡献》(1935)、《欧文著作中的中文编译本: 以年代为序的书目》(1945、1960) 等。荣振华则著有《1700 年左右的中部中国: 传教的地理学研究》(1961、1967、1976)、《近代前期两个世纪的江南传教 (1599-1800)》(1971)、《1552-1800 年在华耶稣会士名录》(1973)、《耶稣会道教史学家》(1976), 编有《北京通信集》(合编 1970)、《1582-1610 年天主教往中国派遣史》(合编 1976)、《明代入华耶稣会士的年度信札 (1581-1644)》(1980) 等。此外, 高第发表了《耶稣会的取缔与北京传教团》(1916《通报》第 17 卷)、《蒙古治下中国和中亚的基督教》(1917《通报》第 18 卷) 等论文。

20 世纪中期以来, 越来越多耶稣会系统之外的学者也参与到入华耶稣会士研究中来。我们可以从 1974 年 9 月尚蒂伊跨学科研究中心主持的第一届国际汉学研讨会看到这一趋势。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北京的活动。会议文集所收十三篇文章中, 或考察中法之间思想文化层面与科学技术层面的双重交流, 或讨论伏尔泰对中国的想象及亲华态度, 或讨论传教士对中英风格花园在欧洲流行的影响, 或介绍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 1735 年由耶稣会士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 刊印的中文中国城市地图原件, 或探讨耶稣会的象征理论即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去寻求旧约中出现的人物, 及其对礼仪之争的影响, 或考察利玛窦时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并揭示中西方思想间的巨大区别 (谢和耐), 等等。<sup>②</sup>会议以“汉学”为名, 已经明确地将在华耶稣会士研究纳入了汉学体系。其不少议题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命题。如, 科技交流方面有马若安 (Jean-Claude Martzloff) 的《梅文鼎 (1663-1772) 的数学著作研究》(1980); 詹嘉玲 (Catherine Jami) 的《傅圣济和中国科学的近代化: 阿尔热巴

<sup>①</sup> 另可参见林悟殊:《西安景教碑研究述评》, 收入刘东主编:《中国学术》, 第 1 卷第 4 辑, 2000, 页 239-260。

<sup>②</sup>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十七和十八世纪北京的法方传教: 国际汉学研讨会文集, Centre de Recherches inter-disciplinaire de Chantilly,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 Cathasia, 1976.

拉新法》(1986)、《三角速算法和精确的圆周率(1774):数学方面的中国传统和西方的贡献》(1990)、《欧洲在中国:十七和十八世纪的科学、宗教和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德罗绘[Hubert Delahaye]合作主编,1993)等。园林建筑方面如毕梅雪的专著《乾隆皇帝的欧式宫殿》(1988)及论文《郎世宁与乾隆换地欧式宫殿的多学科研究》(1989)。礼仪之争方面则有安田朴(René Etiemble)的《入华耶稣会士和礼仪之争(1552-1773)》(1996)。至于谢和耐对中西方思想差异的讨论,则见于其后来在法兰西学院的教学内容,及1979年发表的文章《十七世纪的天主教和中国看法》。其《中国和基督教》(1982)重点考察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中国人的智慧:社会与心理》(1994)一书也讨论了基督教入华时的政治、宗教形势及其在中国的同化问题。此外,施帝恩的一篇文章考察了19世纪中期滇西北民众对法国传教士及新宗教的反应(1996,已有中译本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1[1])。

其它方面,如艺术交流方面则有伯德莱(Michel Beurdeley)的《宫廷耶稣会士画家郎世宁》(1971)、《十八世纪入华耶稣会士画家》(1997);陈艳霞的《中国音乐在十八世纪的法国》(1974);毕梅雪的《郎世宁与中国十八世纪帝王肖像画的复兴》(2004)等。通史类的有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神父的《中国基督徒史》(1992)。综合性论著有迪代伊(Jean-Pierre Duteil)的《上天的使命: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作用》(1994)。鄂法兰(Françoise Aubin)的论文《天主教视野中汉人和蒙古人的宗教情感:十九至二十世纪斯格脱传教士在中国蒙古的经验》(1989)则考察了斯格脱传教士最初奉命在蒙古牧民中布道,最终却主要活跃于汉人小垦农之间的历史,并讨论了天主教对这些垦农的影响。魏明德主要从神学的角度对天主教和基督教进行了考察。他撰有《华人世界中天主教神学家》(1995)、《基督信仰与台湾的宗教图景》(1999)、《耶稣基督与中国的宗教世界》(2001)、《在华耶稣会士:传教士与学者》(2004)、《天主教与汉学研究于台湾-台北利氏学社的贡献》(2004)、《圣方济各·沙勿略传:从传教历史到诠释策略》(2007)、《今日中国天主教神学家眼中的耶稣基督》(2007)、《景教对当代神学的影响》(2007)、《转向未来的中国天主教教堂》(2008)、《华人世界中的耶稣会传教士:梵蒂冈第二次主教会议的转折》(2008)等论文。音乐方面,皮卡尔撰有《十七至十八世纪北京耶稣会士的音乐》(1999)、《北京法方耶稣会士钱德明与贝尔坦的奇珍室》(2006)、《明清时期中西音乐交流概况》(2007)等论文,还为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主编的《中国基督教研究手册》(*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撰写了17、18世纪的音乐部分。此外,黎北

岚则对唐代基督教、摩尼教和祆教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考察（详见下文），还撰写了《中国基督教研究手册》的唐代部分（2001）。马颂仁则有论文《房山十字寺何时为“基督教寺院”？》（2006）。

## 摩尼教和祆教研究

早在 1897 年，法国使馆驻华翻译德微里亚（Gabriel Devéria 1844-1899）就在《亚洲艺术》上发表了《中国的穆斯林和摩尼教徒》。沙畹与伯希和则是最早对摩尼教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专门考察的学者。1903 年，伯希和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摩尼与《化胡经》的札记。之后，伯希和与其老师沙畹合作，将罗振玉刊布于《国学丛刊》的《波斯教残经》翻译成法文，并进行考释，最终考定此经为摩尼教残经。其成果在 1911 年、1913 年发表于《亚洲学报》，是为《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20 年代，伯希和又发表了《福建的摩尼教遗迹》（1923《通报》第 22 卷第 3 期）一文，以及“摩尼教之默奚悉德”札记（1925《通报》第 26 卷第 4-5 期。伯希和关于摩尼教的研究大都有冯承钧中译本）。此外，吴其昱（1919-2011）在 1991 年发表了《摩尼传记中之年代问题》，收于《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黎北岚师承程艾蓝，其博士论文对中国的祆教进行了考察，近年来发表了《唐代的基督教、摩尼教和祆教（618-907）》（2000）、《中国粟特人的丧葬实践：基于新近考古发现的几点看法》（2003）、《西安一座粟特人墓葬所见之祆教》（与葛乐耐[Frantz Grenet]、杨军凯合撰，2004）、《祆神崇拜：中国境内的中亚聚落信仰何种宗教》（2005）等论文。其中，《六至十世纪伊朗语世界的宗教在中国的传播》（2006）对源于伊朗语世界的祆教、摩尼教和景教在中古中国的传播进行了总体性探讨。

## 伊斯兰教研究

谈及中国伊斯兰教的早期研究集中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主要有梯尔桑的专著《中国和东突厥斯坦的伊斯兰教》（1878）；探险家奥龙（Henri Ollone 1868-1945）的《云南的伊斯兰教》（1908）、《中国穆斯林研究》（1909）、《论中国穆斯林“回回”称呼的起源》（合撰 1911）、《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1912）等文章；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 1858-1930）

的论文《杭州的伊斯兰教》(1913); 德韦里亚的论文《中国伊斯兰教的起源》(1895) 以及上面提到的《中国的穆斯林和摩尼教徒》。

法国当代学者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关注开始于 1970 年代。如乔约 (François Joyaux) 和谢诺 (Jean Chesneaux) 的《人民中国的穆斯林》(1976), 重点叙述了 1949 年以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情况。1991 年, 杜瑞乐在《汉学研究》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民族宗教, 宗族宗教: 论海南一个汉人宗族的伊斯兰教化试图》。1980 年代, 海南儋县的一支蒲姓在得知自己源出穆斯林之后的伊斯兰教化尝试。与此同时, 儋县另一支蒲姓的宗族重建和仪式复兴却“正常地”与道士、灵媒等不同于伊斯兰教的仪式专家建立起联系。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使宗族意识陷入困境。杜瑞乐在文中通过考察蒲姓的伊斯兰教化实践, 对身份认同与宗族意识进行了引人入胜的讨论。<sup>①</sup>

伊丽莎白是一位需要重点介绍的当代学者。她对伊斯兰教的考察始于其博士阶段。其博士论文集中考察了河南一个穆斯林的毛皮鞣制村, 以及郑州、开封两市的居民, 1998 年通过答辩, 并在 2000 年以《中国穆斯林——河南回族的人类学研究》为题出版。<sup>②</sup>这本使她饮誉国际学界的专著主要分为三部分, “回民: 过去与当下”、“回民与汉人: 特性、相似性与较量”和“清真寺: 宗教生活的中心”。其中, 讨论宗教的最后一部分是该书的亮点。在这部分中, 伊丽莎白着重考察了河南及邻近各省特有的清真女寺。这些女寺通常是与大的宗族或城市中的同村移民社区相联系的。其数量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不断增长。此外, 这些女寺也反映了其中传统派与改良派之间紧张的关系。伊丽莎白细致地阐述了女寺的运作, 及其宗教主持——阿訇的工作。最后, 该书的结论认为, 回民穆斯林作为种族身份的建构使其能够和谐地融入一个“不信教”的社会。而他们兼具的汉人与穆斯林这两重身份是并置, 而不是混合的。因此, 其对作为汉人与作为穆斯林的文化实践也是有明显区分的。这本专著之后, 伊丽莎白主要采取比较研究的方式, 对照边远地区的伊斯兰教和中国内地的伊斯兰教这两种不同背景下的少数民族, 即一千万讲汉语的回族穆斯林和九百万讲土耳其语系的维吾尔族穆斯林, 继续考察中国穆斯林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其兴趣还扩展至中亚的东干族, 以及中国边疆和边境地区身份认同的新形态等等。除了专著《中国穆斯林》, 她还撰有《中国东北穆斯林丧葬

---

<sup>①</sup> Joël Thoraval, “Religion ethnique, religion lignagère. Sur la tentative d’islamisation’ d’un lignage Han de Hainan,” in *Études Chinoises*, vol. 10, no. 1-2, 1991, pp. 9-75.

<sup>②</sup> Élisabeth Allès, *Musulmans de Chine. Une anthropologie des Hui du Henan*, Paris: Éditions EHESS, 2000.

仪式笔记》(1991)、《中国伊斯兰教：女性阿訇》(1994)、《面向女性的伊斯兰教组织：中国的女性清真寺》(1994)、《中国的女性清真寺：记忆还是遗忘？》(1997)、《中国伊斯兰教：统一与分裂》(2003)、《孔子、阿拉与毛主席：中国的伊斯兰教》(2001)、《中国穆斯林的宗教教育》(2002)、《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十九世纪至今的反宗教挑衅与反教权态度》(2002)、《宗教团结还是文化团结：新疆回民的微妙处境》(2004)、《伊斯兰教在中国的适应》(2004)、《中国的清真寺：身份与现代性的载体》(2009)、《华人世界中的伊斯兰教》(2010)、《二十世纪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2011) 等文章。

### “奇理斯玛”：对宗教权威的研究

对宗教人物、特别是宗教领袖或精英人物的生平追述，始终是中国宗教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法国学者的相关成果已在前文以分散的方式有所涉及。不过，有关“奇理斯玛”的研究，却值得单独提出加以介绍。奇理斯玛(charisma)或译作“卡理斯玛”、“奇魅”，字面意思为超凡魅力、神授能力、卓越的领导力等，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锻造成为有关权威的分析性概念。在中国宗教研究领域，英国人类学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和他的中国弟子王铭铭于2001年出版了合著《草根权威》，首先对奇理斯玛进行了专门探讨。<sup>①</sup>该书将“奇理斯玛”定义为“一种对非凡的期待”，从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交叠、现实和象征融汇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东南部孕育奇理斯玛的土壤，即地方的宗教-政治连续体。2007年，由宗树人、高万桑、吴梓明(Peter Tze-Ming Ng)组织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社会整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其重要议题之一即为“奇理斯玛”，王斯福也受邀出席。作为香港会议对奇理斯玛讨论的继续深入，高万桑于次年与加拿大学者王大为(David Ownby)合作，为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季刊《新宗教》(*Nova Religio*)主编了一期专辑，题为《绘制中国宗教中的奇理斯玛》。<sup>②</sup>

<sup>①</sup> Stephan Feuchtwang, Mingming Wang, *Grassroots charisma. Four local leaders in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sup>②</sup> Vincent Goossaert, David Ownby (eds.), *Mapping Charisma in Chinese Religion (Nova Religio: 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Emergent Religions*, vol. 12, no. 2), 2008. 法国学者的三篇论文为：Vincent Goossaert, “Mapping charisma among chinese religious specialists,” pp. 12-28; Ji Zhe, “Expectation, affe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the charismatic journey of a new buddhist group in Taiwan,” pp. 48-68; David A. Palmer, “Embodying utopia: Charisma in the post-Mao Qigong Craze,” pp. 69-89. 王斯福的回应详参(亦收入是辑)：Stephan



参与该专辑的法国学者除高万桑外,还有汲喆和宗树人。受王斯福与王铭铭的启发,该专辑致力于探讨奇理斯玛在形塑华人宗教的持续变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专辑论文的作者均从王斯福、王铭铭在《草根权威》中提出的奇理斯玛定义出发。该定义的深意在于指出了奇理斯玛并不是个体性的,而是源于他者,如民众对其领袖在良好统治、增加民众财富、促进和平等方面的期待。《绘制中国宗教中的奇理斯玛》的作者由此进一步探讨了民众所期待的“非凡”,其定义、应许、协商与实现是如何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特殊语境中、特别是在当代新兴宗教团体中达成的。其中,高万桑的《绘制中国宗教法士的奇理斯玛》讨论了如何运用“奇理斯玛”对多元的中国宗教法士进行分类和理解的问题。汲喆的《期望、情感与责任:一个台湾新佛教组织的奇理斯玛之旅》考察了台湾的“现代禅”及其创始人李元松的特殊历程,从莫斯所揭示的“礼物”视角,以社会互动论解释了奇理斯玛权威的建立和集体宗教行为。宗树人的《切身化的乌托邦——后毛泽东时代气功热中的奇理斯玛》则细致地分析了气功师是如何创造身体的奇理斯玛的。此外,王斯福也对专辑中的论文作出了回应。与先前的研究相比,该专辑的考察重点不是政治因素或政教关系,而是在宗教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宗教权威本身;其收录的文章将历史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熔为一炉,拓展了宗教人物研究的理论视野。

## 对中国宗教现代性的研究与理论探讨

法国对 19 世纪末以来中国宗教的研究,继承了欧洲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现代性”问题意识,形成了独到的成果。近年来,高万桑先后发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宗教的命运》(2003)、《1898: 中国宗教终结的开端?》(2006)、《近代中国“宗教”的发明》(2007)、《丧葬改革与中国的宗教政策, 1900-2008》(与方玲合撰, 2008) 等文章,分析了民族国家政治和西方有关宗教的现代话语对中国宗教景观的建构。这些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与宗树人合著的《近代中国的宗教问题》一书中。<sup>①</sup>该书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宗教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第一部分的七章考察了中国宗教问题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第二部分则通过多线叙事手法,对包括海外华人社区在内的整个华人世界

---

Feuchtwang, “Suggestions for a redefinition of charisma,” pp. 90-105.

<sup>①</sup> 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A.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法文版: *La question religieuse en Chine*, Paris: Éditions CNRS, 2012. 参见汲喆的中文书评, 收入李四龙主编:《人文宗教研究》, 第 2 辑,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 页 323-332。

多样的宗教现代性进行了讨论。该书将宗教置于与政治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中加以研究，同时也揭示了宗教变迁对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形塑作用，出版后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多方好评。尽管十年来对中国宗教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象该书一样内容广泛、见解深刻的作品仍不多见。可以认为，该书是自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以后对中国宗教进行总体考察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汲喆则注意到了在中国语境中宗教与教育的特殊关联及其对中国宗教现代性的意义。2011年，由他主编的法国学术年刊《远东远西》第33卷题名为《现代中国的宗教、教育与政治》，收录了来自不同国家学者的七篇研究性论文和在德国主持马普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的著名人类学家范德威（Peter van der Veer）对这一议题的综合评论。在导论中，汲喆从制度分化与价值分化的观点出发，将以庙产兴学和废除科举为标志的近代教育改革视为中国宗教现代性的起点，并提出，世俗主义在早期现代中国的实践历程，就是由“教”所统摄的信仰、知识与权力三位一体的传统秩序发生分裂与重组的过程。

①

在对现当代中国宗教的研究中，法国学者已经超越了基于文献、考古或民族志调查的描述性研究，与法国思想界的对话也日益深入。2010年，魏明德出版了《失去中央的帝国——论中国之走出宗教》一书。<sup>②</sup>该书借用了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戈谢（Marcel Gauchet）的“基督教作为走出宗教的宗教”的概念，来探讨中国宗教、特别是注重社会关系的儒教在何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走出宗教的宗教”。2012年12月，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围绕“世俗化理论与中国”的研讨会，戈谢本人、魏明德、高万桑、汲喆都出席并参与了讨论。

事实上，世俗化始终是研究现当代中国宗教无法回避的一个主题，而政教关系的变化则是世俗化问题的核心。对此，高万桑做过细致的历史学研究，发表的论文有《反教权论的解析：〈申报〉（1872-1878）》（2002）、《中国的伪政教分离（1898-2004）》（2005）、《政教分离与“宗教”的发明：1912年在中国成立的全国性宗教协会》（2010）。在《近代中国的国家与宗教：宗教政策与学术典范》（2006）一文中，他总结了政治、宗教与

---

① Ji Zhe, “Le *jiao* recomposé. L’éducation entre religion et politique dans la modernité chinoise,” in Ji Zhe (ed.), *Religion, éducation et politique en Chine moderne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vol. 33)*, Saint-Denis: PUV, 2011, pp. 5-34.

② Benoît Vermander, *L’Empire sans milieu, essai sur la sortie de la religion en Chine*, Paris: DDB, 2010.

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世俗化、清至现代的连续性、压制与反抗、（正/邪、正统/非正统、宗教/迷信等）二元、传统更新等五种典范，并指出地方宗教政策史的研究可为未来值得注意的方向之一。汲喆则注重 1949 年、特别是 1980 年以后的中国的政教关系和世俗化境遇，发表有《作为宗教重构的世俗化》（2008）、《中国改革时期的佛教：世俗化的复兴？》（2011）等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汲喆借助福柯的话语理论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出以一种重视“支配—被支配关系的辩证法”和“意外后果”的复杂的权力理论来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教关系。他率先将“国家化”和“单位制”等有关当代中国的一般性分析范畴运用到宗教研究上，使这些概念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重视和进一步阐发。<sup>①</sup>

### 实施中的研究项目及计划

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的研究项目每四年更新一次。其中，与中国宗教有关的有马修·卡普斯坦和穆瑞明主持的“中古中国、日本和西藏的佛教与宗教”、王微与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黑水城文献中藏文写本的中文翻译”、让-吕克·阿沙尔和伊夫·卡多（Yves Cadot，日本学研究所）主持的“实践与身体”、阿兰·罗什（Alain Rocher）主持的“东亚宗教与哲学传统中的解释理论及其实践”、王微主持的“中华帝国印藏影响之下的宇宙观念表达型宗教建筑”（始于 2006 年）、杜德兰主持的“‘楚王国’考古项目”、马如丹（François Martin）主持的“中古前期中国的个体、群体与社会（公元 220-617 年）”、童丕（Éric Trombert）与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主持的“北部边境与西部拓跋至西夏边境：整合与分化”、戴仁主持的“文本的物质性——战国至宋初中国写本的整理（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十世纪）”、劳格文主持的“徽州传统社会”、卡蒂亚·比夫特里主持的“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现代性与仪式：机制、挑战与合法化”、马修·卡普斯坦主持的“西藏的历史写本与哲学思想”、让-吕克·阿沙尔主持的“大圆满”、今枝由郎发起的“敦煌写本与在线藏文古文书”、西藏文明研究组的“藏族社会的社会史（十七至二十世纪）”等项目。

远东学院的东亚宗教人类学项目中，有华澜主持的“道教与乡土社会”（始于 2003，

---

<sup>①</sup> 参见 David A. Palmer, 2009, “Les *damwei* religieuses: L’institutionnalisation de la religion en Chine populaire,” in *Perspectives Chinoises*, vol. 109, pp. 19-33 ; Thomas Borchert, “The Abbot’s New House: Thinking about How Religion Works among Buddhist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in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52 (1), 2010, pp. 112-137.

主要考察湖南的神像)、吕敏和陆康(Luca Gabbiani)主持的“北京寺庙的碑刻与口述记忆——帝国首都的社会史”(始于2004)、吕鹏志的“道教史”和“显应雷坛:江西铜鼓县的道教仪式传统”(与赣州市博物馆的刘劲峰合作);佛教传播项目中则有史基伶(Peter Skilling)主持的“亚洲的佛教传播与本土化”、谷岚主持的“藏传佛教在台湾的实践”等。

其它机构,如社会·宗教·政教关系研究所则有艾文与贾珞琳主持的“亚洲宗教与社会”研究计划,其中又有方玲与高万桑共同主持的“法国华人宗教”项目、高万桑主持的近现代中国城市道士与庙宇研究计划(与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合作)、汲喆主持的“后毛泽东时代的佛教:1980年以来中国的宗教、政治与社会”项目。喜马拉雅研究中心有施帝恩负责协调的“康区印藏边缘的领地、社区与交换”项目和尼古拉·西雷主持的“佛教的人类学研究”项目。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毕游塞、杜瑞乐与东京大学的中岛隆博(Takahiro Nakajima)合作主持了“当代中国的儒家复兴”项目。社会学与人类学比较研究组有谢道琳主持的“师父(Vieux maîtres)”研究计划,主要研究1949年之前就已入行且精于宗教技术的宗教法士。

法国学界的项目成果以及法国学者主持的其它学术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如劳格文主编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涉及到以宗教为核心内容的地方社会的方方面面。<sup>①</sup>再如劳格文主编的《中国宗教:新方法、新挑战》(2002)、《宗教与中国社会》(2004)、《亚洲的宗教与政治:历史与现实》(2006)、《古代和中古中国的宗教与社会》(2009);劳格文与马克主编的《早期中国宗教:商朝至汉朝(公元前1250至公元220年)》(两卷本,2009);劳格文与吕鹏志主编的《早期中国宗教:分裂时期(公元220-589年)》(两卷本,2010);吕敏主编的《尧山圣母庙与神社》(与秦建民合作,2003)、《北京内城寺庙碑刻记》(与董晓萍合作,第一、第二卷,2011)、华澜主编的《“湘中宗教与乡土社会”调查报告集》(与陈子艾合作,三卷本,即出)等。<sup>②</sup>此外,劳格文与马颂仁主持的“宋金元时期中国宗教”研讨会(香港,2012年6月)、劳格文与高万桑主持的“近代中国宗教(1850-)”研讨会(香港,2012年12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学界的关注点和研究水平,亦

---

<sup>①</sup> 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30册),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1996-2006。

<sup>②</sup> 关于《“湘中宗教与乡土社会”调查报告集》,详参 Georges Favraud, “Liturgie et construction d'une identité culturelle régionale en Chine contemporaine 仪式与当代中国一个区域文化认同的建构,” in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 19, pp. 305-328.

可谓中国宗教研究领域的盛事。

## 结语：特点与趋势

上文已经提到法国特有的科研体制及法国远东学院的影响。不过，在此仍需强调法国远东学院的巨大作用，很多考察工作、研究计划都源于此，其在整个东亚研究——当然也包括中国宗教研究——中的平台作用是独一无二和举足轻重的。此外，法国的中国宗教研究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很多成果建立在敦煌文献的资料基础之上，属于敦煌学的框架之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敦煌的遗产。其次，道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所占的比重很大，天主教研究也是大项，这些领域是法国方面中国研究的专长。第三，多将研究置于整个东亚，或是整个亚洲的语境之下进行考察。从他们研究项目的设计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第四，学者在语言学和文献学的训练方面倾注了很多精力，这使得他们能够比较轻松地对同一族群或区域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或是从事跨区域的比较研究。

至于近年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法国方面中国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势。首先是研究范式的转变。研究方法视野从早期主要是传统的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扩展到社会学科，尤其是社会学与人类学。其中，社会学取向的研究又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上半叶年鉴学派社会学大师葛兰言对中国古典社会宗教的研究。其次，越来越多汉学/藏学系统之外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也有不少学者的研究导师并非汉学/藏学系统的学者，无疑都给这一领域注入新鲜的血液。第三，田野调查传统的恢复与发展。这一传统其实可以追溯到法国远东学院，以及沙畹、伯希和、巴科等早期学者。其中，沙畹是当之无愧的汉学田野传统创始人。其学生伯希和到中国西北地区做考古发掘，对敦煌进行考察，并把西域考古所出文物，以及敦煌大量的文书、画像、雕像等藏品运回巴黎。在这些早期学者之后，田野调查的传统有短期的断层。一个原因，是伯希和运回巴黎的敦煌写卷等大量文献、资料，而使很多法国学者长期埋头于这些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当中。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田野传统首先在台湾、香港等地，然后在大陆得到重建和发展。以道教研究为例，施舟人可以说是该领域田野工作的开创者。同时，即便是致力于古代宗教研究的学者也认识到了田野考察的重要性，例如穆瑞明对四川的考察。第四，对现当代中国宗教变迁的关注。一方面，社会科学出身的学者加入到中国宗教研

究中来,使研究的起点迅速转变到当代。另一方面,不少原先研究中国古代宗教的学者,也开始将关注的时段扩展到近代。第五,国际合作的加强。目前法国学界的不少相关研究项目和计划虽然由法国学者主持,但均为整合了欧洲、东亚与北美力量的国际合作团队,并常常得到来自法国以外的资金支持。对此,高万桑还曾撰文《国际性合作与协作的寻求及其对法国汉学研究的影响》(2010)进行讨论。总的来看,法国的中国宗教研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传统之深、视野之广、观点之新、人才之盛,令人瞩目。

**补遗:**“汉传佛教研究”部分遗漏了一位学者,即牟和谛(Costantino Moretti),其研究成果请登陆 <http://www.crcao.fr> 查询。

此文刊于曹中建、郑筱筠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2011-2012),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56-397页。